

# 中國文學學報

第五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封面：

董其昌 (1555–1636)，行書詩軸

DONG QICHANG (1555–1636), Poem in running script

95.465 (北山堂惠贈)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品，文物館惠允複製」

學報名稱字體集自《曹全碑》

## 中國文學學報

出 版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00871 北京市海澱區 電話：(10) 62751601 傳真：(10) 62759366 電郵：zhgwxxb@163.com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香港新界沙田 (852) 3943 7074 (852) 2603 6048 chilan@cuhk.edu.hk
發 行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何東夫人堂 電話：(852) 3943 9800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主 編	陳平原 張洪年	
編 輯	《中國文學學報》編輯委員會	
排版印刷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際書號	ISSN 2218-8967	

# 中國文學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 |                |     |                          |
|----------------|-----|--------------------------|
| 主席             | 陳平原 | Chen Pingyuan            |
|                | 張洪年 | Cheung Samuel H.         |
| 委員<br>(按姓氏筆劃序) | 王 風 | Wang Feng (北京大學召集人、執行編輯) |
|                | 周建渝 | Zhou Jianyu (香港中文大學召集人)  |
|                | 何杏楓 | Hoyan Carole H.F.        |
|                | 張 健 | Zhang Jian               |
|                | 賀桂梅 | He Guimei                |
|                | 華 瑋 | Hua Wei                  |
|                | 傅 剛 | Fu Gang                  |
|                | 廖可斌 | Liao Kebin               |
|                | 樊善標 | Fan Sin-piu              |
|                | 錢志熙 | Qian Zhixi               |



# 目錄

對語的生成與規則：以《對類》為中心.....	張 健	1
歷史、記憶與國族認同		
——《嶺南摭怪列傳》之歷史敘述.....	周建渝	21
《臨川夢》、湯顯祖與《牡丹亭》		
——兼談文人傳記劇的評價問題.....	華 璋	35
清初文人陸次雲的女性傳記書寫		
——以〈圓圓傳〉、〈海烈婦傳〉為例.....	胡曉真	59
興民與小說定位：許壽裳遺稿〈中國小說史〉初探.....	黃英哲	77
一八七〇年代的亞際文化融匯：		
由《朝野新聞》所載詩文論王韜與中日菁英社群.....	呂文翠	93
「轉譯」中的法國左翼文藝		
——論戴望舒譯伊凡諾夫《鐵甲車》.....	鄺可怡	123
張愛玲、布萊希特、魯迅論中國戲曲.....	陳丹丹	145
《眉語》女作家高劍華小說的自我呈現.....	黃錦珠	185
論茅盾早期小說中的婦女解放論述與革命意識(1927 – 1930).....	李凱琳	207
陳映真與香港文藝刊物(1960–1970年代).....	葉嘉詠	229
近年本土運動之中與之前的香港郊野遊記		
——從劉克襄《四分之三香港》回溯一九七〇、八〇年代.....	樊善標	241
幻滅與劫毀的尋夢之旅 —— 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中的「桃花源記」.....	莊宜文	269

稿約

撰稿格式

# Contents

The Generation and Regulations of Couplets: Concentrating on the <i>Duile</i> .....	Zhang Jian	1
History, Memory and Ethnopolitical Identity—Historical Narrative in <i>Lingnan zhiguai liezhuan</i> .....	Zhou Jianyu	21
<i>Lin chuan meng</i> , Tang Xianzu and <i>Mudan ting</i> —With a Discussion of Problems of Criticism of Biographical Drama about Literary Figures.....	Hua Wei	35
Women’s Biographical Writing of the Literatus Lu Ciyun in the Early Qing—The Examples of <i>Yuanyuan zhuan</i> and <i>Hai liefu zhuan</i> .....	Hu Siao–chen	59
Xing min and the Positioning of Fiction: On Xu Shoushang's Posthumous Work <i>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i> .....	Yingche Huang	77
Inter–Asia Cultural Fusion In The 1870s: On Elites of China and Japan by Wang Tao’s Writings Republished in <i>Choya Shinbun</i> .....	Lu Wen–tsuei	93
Dai Wangshu’s Relay–translation of Vsévolod Ivanov’s <i>Le Train blindé numéro 1469</i> .....	Connie Ho–yee Kwong	123
Eileen Chang, Bertold Brecht, and Lu Xu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Dandan Chen	145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Fiction of Gao Jianhua, A Woman Writer of <i>Eyebrow Talk</i> .....	Huang Jinzhu	185
A Study of Mao Dun’s Discourse of Woman’s Liberation and Revolution in his Early Fiction (1927 – 1930) .....	Lee Hoi Lam	207
Chen Yingzhen and Hong Kong Literary Journals (1960s–1970s) .....	Yip Ka Wing	229
Recent Indigenization Movements and Travel Accounts of Peripheral Areas of Hong Kong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	Fan Sin Piu	241
A Dream Quest of Disillusionment and Annihilation— <i>Taohuayuan ji</i> in Modern Long Novels .....	Zhuang Yiwen	269

Information to contributors

Guide for Submissions to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 一八七〇年代的亞際文化融匯： 由《朝野新聞》所載詩文論王韜與中日菁英社群

呂文翠\*

## 前言

1870年代末的亞際文化生態有過奇特一幕：文人的行走與聚合，詩文的流播與相互激蕩，無論朝野，不限中日，悉由報紙而生，《朝野新聞》、《循環日報》與《申報》形成文化走廊，串聯東京、香港和上海，又遠遠應答歐西現代，其軸心人物是王韜。

光緒己卯年(1879)，居住在香港，因《普法戰紀》而揚名東瀛的王韜(1828–1897)受邀訪日，與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朝野人士、清廷駐日公使及當時寓日華士多有交流。在日本期間，東京兩大日報《郵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皆刊登不少王韜的政論文章及其與中日友人贈答酬和的漢文詩歌作品。由於歷來已有不少學者通過《郵便報知新聞》闡釋王韜在日發表的詩文及其影響，<sup>1</sup>但同樣保留不少同時期珍貴文獻的《朝野新聞》，學界鮮有系統性的介紹與分析，故本文以《朝野新聞》所登載王韜其人其文與在日期間的文化活動，報紙上乍看無一貫脈絡，仔細疏理卻饒富文化交融意義的相關消息，自下述方向深入探究十九世紀末葉亞際文化融匯的複雜內涵。

一、王氏赴日前不久，清廷派遣的大使何如璋(1838–1891)、副使張斯桂(1816–1888)、參贊黃遵憲(1848–1905)等人已駐節東京。《朝野新聞》除陸續刊出清使團成員與日東文士間唱和贈答的詩文，亦開始出現轉載自王韜於香港創辦的中文報《循環日報》之詩歌、政論與國際消息。時值琉球事件引爆的中日兩國外交難題，除暴露清

---

\* 呂文翠，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sup>1</sup> 王曉秋曾在〈王韜日本之遊補論〉一文中，探討王韜1879年赴日期間，日本東道主栗本鋤雲擔任主編的日報《郵便報知新聞》上所刊載的王韜消息與詩歌及議論(四篇論文)，讓我們對王韜在日的文化活動，有更深入的了解。見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395–408；另見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代中國》，第12輯，2002年12月，頁168–243；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見《台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2006，頁131–171。

廷朝貢體系瓦解之兆，投射了巨變中的國際情勢，也具體呈現兩國朝野人士辯難交鋒的思想言論；副使張斯桂《使東詩錄》系列詩作刊登轉載於東亞三城（上海、香港、東京）報紙，標誌中日外交史與文化史已進入嶄新階段，掩映出日益複雜的亞際文化交流課題；二、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界著重撰譯外國史的風潮、新聞紙與報社成為輿論公器，都形塑了迎向西潮的近代日本社會文化新風貌，不僅影響王韜的史學觀，並在他日後的史志書寫上留下深刻印痕；三、在日時期觀察明治新政十餘年的社會文化影響，與日本漢學家及朝野開明文士人的近距離接觸，皆使此前曾考察西洋文化的王韜無形中吸納東洋異域文學的養分，為其日後撰寫志怪傳奇體的筆記小說注入融合東西洋文化的嶄新元素，增益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豐富多元。

通過上述這些層面的考察分析，試圖重新擬構王韜和十九世紀末葉亞際菁英社群互動融通之軌跡，呈現此交流所輻輳出的東亞城市—上海、香港、東京—三地的思想文化之跨域匯合，此一融通、匯合的過程當然不無複雜的張力結構，本文即著力於這一最新呈現的總體態勢，審思其開展或後續發酵的豐碩文化動能。

## 一、交流新序章：《朝野新聞》上的清國使團身影與《循環日報》消息

光緒四年（1879）暮春王韜赴日時，距離他1862年捲入通敵太平軍疑雲而自上海出逃避禍至香港，已近十八年。在這段不算短的歲月中，他創辦中文報《循環日報》（1874年4月）並擔任主筆，主持中華印務總局，不管在報刊界或出版業，皆擁有舉足輕重地位。受日本《郵便報知新聞》主筆栗本鋤雲（1822–1897）之邀，他取道上海轉赴東瀛，以東京為中心展開四個月餘的遊歷，當地兩大日報（《郵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紛紛刊載其詩文作品，漢文期刊也收錄王韜曾發表在香港報紙上的文章。<sup>2</sup>漢學素養深厚的日本新舊派知識菁英因《普法戰紀》與王韜神交已久，自然對其禮遇有加，他的作品突破了國界及語言的限制，繼上海報刊界之後，頻頻在日本新聞業與文化界亮相，可以說，東京文壇儼然成為漢土之外的另一座王氏登場展演的舞台。居停百廿餘日行將回港前，此期間寫下的漢文日記《扶桑遊記》三卷亦交由東京三大報社之一「報知新聞社」加上日文訓讀出版。<sup>3</sup>東京的讀者不難透過此書清楚得知王韜扶桑歲月所見所思，該書亦因香港與上海發達的報刊出版業而流通廣遠，成為晚清時期開明文士了解日本明治維新文化社會狀況的重要書籍。

<sup>2</sup> 如以佐田白茅為首的大來社定期發刊的《明治詩文》第四十二期〈外集〉部分，便錄有王韜〈粵逆崖略〉一文。見夏曉虹：〈扶桑：追尋歷史的蹤跡（關東篇）〉，見夏氏著：《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頁7–8。

<sup>3</sup> 王曉秋考證，日本報知新聞社於1879年12月15日發行上卷《扶桑遊記》（收1879年4月27日至5月25日的日記），中卷為1880年5月12日（收1879年5月26日至7月6日的日記）發行，下卷為1880年9月29日發行（收1879年7月6日至9月29日的日記）。王曉秋：〈王韜日本之遊補論〉，收入《王韜與近代世界》，頁403。

假如《普法戰紀》是王氏吸納歐洲經驗後的文化產物，那麼《扶桑遊記》除了是晚清第一批「東遊日記」其中佼佼，更微妙地呈現了上海、香港、東京三地間隱然存在著一條看似大道通衢卻又藏著許多歧路幽徑的「文化迴廊」，標誌出王韜作為十九世紀末葉東亞漢文化圈的「觸媒」人物，以報刊界為中心，催發了三城間活躍的能量「化合」作用。作為近代日本頗具影響力的東京日報《朝野新聞》正錄下王氏在三城間引動與釋放的這股活躍能量，將之與其日記參詳對照，恰可提供我們從另一視角重審1870年代亞際知識菁英的跨域融匯。

《朝野新聞》乃《公文通誌》(明治五年十一月創辦)的改名版，明治七年(1874)九月由成島柳北(1837-1884)出任社長與主筆。王韜在日記裡便曾對成島柳北與另兩大東京日報主筆栗本鋤雲、福地源一郎(《江湖新聞》主筆)等敢於批評時政的重量級報人多有讚譽。<sup>4</sup>值得注意的是，王韜與成島柳北身為香港(、上海)和東京報刊界大老，兩人又同樣具有歐洲遊歷的經驗(分別在1867年與1872年啟程遊歷歐洲，時間或近一年，或長達兩年餘)，<sup>5</sup>對泰西文化特別是新聞報刊界與出版業有較為深刻的觀察，這些親身體驗都增廣拓深了視野，成為他們日後擔任報社主筆的重要思想資源。

從近代中日關係來看，雖然同治年間清廷已與日本正式建交並簽訂《中日修好條約》(1871年8月，明治四年)，但中國公使團卻因西鄉隆盛為首發動的「西南戰爭」<sup>6</sup>而延後出行。光緒三年十二月(明治十一年，1878年1月)戰事平息後，才由第一任公使何如璋、<sup>7</sup>副史張斯桂<sup>8</sup>率團前往日本就職，同行數十人員中還有參贊黃遵憲、<sup>9</sup>

<sup>4</sup> 見王韜：《扶桑遊記》，據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扶桑遊記》版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78。

<sup>5</sup> 參見前田愛：《幕末・維新期の文學 成島柳北》(東京：筑摩書房，1989年)，頁544-551。

<sup>6</sup> 西南戰爭(1877年2月至10月)是以西鄉隆盛為盟主的士族(薩摩藩士族)，以清君側名義所發動的起事，也是日本最後的內戰。明治政府軍最終擊敗薩摩軍，西鄉隆盛撤退回鹿兒島，在負傷的情況下由部下介錯(切腹儀式中，自己切開腹部後由他人砍下頭顱)而逝世，也宣告西南戰爭的結束。此役驗證了明治軍事改革的成果，代表明治維新以來倒幕派的正式終結。

<sup>7</sup> 何如璋，字子峨，嶺南人，在日本駐留近四年，於光緒六年十一月(1880年12月)被召回，後由許景澄接任。

<sup>8</sup> 張斯桂，字景顏，號魯生，世稱「張魯生」，浙江寧波秀才，曾從學於在寧波傳教的美國著名傳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1854年曾任中國第一艘機器輪船「寶順輪」的船長，屢有戰功，以其才幹聞名而入曾國藩幕下，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亦曾入沈葆楨幕下，主持福州船政局，推行水雷、電信的國產化。1864年，為丁韪良的《萬國公法》中文譯本作序言，以春秋列國比喻歐洲時局，王韜曾讚譽其創見。1876年，奉旨欽差出使日本，擔任首任副使，1882年歸國任廣平知府，光緒十四年卒於任。

<sup>9</sup> 黃遵憲，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梅州，光緒二年舉人，隨首任出使日本國大臣何如璋前往東京，到光緒八年(明治十五年，1882年3月)調任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在日本居留四年餘。

隨員沈文燮、<sup>10</sup> 廖樞仙等人。<sup>11</sup> 兩國締約後關係更為緊密，《朝野新聞》上每每得見來自中國的近事要聞。特別是此前兩年，即光緒丁丑（1877）、戊寅（1878）兩年中國北方魯、冀、陝、晉、豫等各省發生百年未見的旱災，史稱「丁戊奇荒」。饑民餓殍數萬餘人，為求活路的災民紛紛湧向南方，在官府財政匱乏、吏治腐敗與糧倉空虛等不利因素下，災情若燎原之勢迅速擴大。江南沿海各地縉紳商賈紛紛發起賑災活動，東南沿海貿易重地如上海的《申報》上更頻繁刊出各種呼籲民間助賑的議論消息，除了蘇州、揚州、杭州、鎮江等地設有助賑機構相互支援，海外如美國、日本的華人也設立助賑點響應義舉。<sup>12</sup>

翻開明治十一年（1878）三月至九月的《朝野新聞》，幾乎每隔幾天即可見標題為〈支那救恤記事〉之文，下設〈清國饑民救恤錄金姓名錄〉與〈華族<sup>13</sup>諸君姓名錄〉兩大欄位，逐條注明捐款者的姓名與捐助之金額，日人捐款跨國捐糧救賑饑荒的熱情於此可見。明治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朝野新聞》〈支那救恤記事〉，特別刊登當時奉外務卿大久保利通之命前往中國交付救災款項、米麥糧食的使臣竹添進一郎，<sup>14</sup> 由上海至天津途中所記災情實況的書信。信中提及上海的《申報》刊載「河南奇荒鐵淚圖」描繪災區凶荒悽慘之情態，欲喚起各界仕紳庶民持續響應恤災。經過大半年的各方救

<sup>10</sup> 沈文燮（1833–1886），字心燦，號敬軒，又號梅史，浙江餘姚人。咸豐二年（1852）副貢，九年（1859）舉人，曾招集義勇抗擊太平軍。同治四年（1865），由陝西提督雷正綰聘為記室，轉戰關外，跋涉於天山蔥嶺之間，以戰功授正五品陝西省候補直隸知州。光緒三年（1877）十一月任出使日本隨員，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西渡回國。

<sup>11</sup> 據何如璋所載使節團詳細的成員有：「十月十九日庚子，拜摺具報出洋日期，並奏帶隨使人員。癸卯，偕張副使登程。同行有參贊黃令遵憲、正理事范丞錫明、副理事余舍人，及翻譯隨員沈二尹鼎鐘、沈牧文燮、廖教習錫恩等十餘人，共帶跟役二十六名。」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使東述略》（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90。

<sup>12</sup> 參見楊劍利：〈晚清社會災害救治功能的演變——以「丁戊奇荒」的兩種賑濟方式為例〉，《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頁59–64。

<sup>13</sup> 華族乃指是日本於明治維新後至《日本國憲法》頒布前（1869–1947年）存在的貴族階層，包括來自公卿世家的「公家華族」、來自江戶時代各藩藩主的「大名華族」、對國家立有功勳的「助功華族」、以及臣籍降下的「皇親華族」等。

<sup>14</sup> 由於竹添氏代表官方與民間赴中國救災，出力甚勤，傅相李鴻章對他兢兢業業的態度印象深刻。後來李還曾為他遊歷中國京、冀、豫、陝、川、渝順江至上海的《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一書作序，此書1879年在日本出版（《朝野新聞》明治十二年五月四日第五頁附錄，曾刊登東京「奎文堂」發售該書的廣告：《棧雲峽雨日記並詩草》全三冊），很快成為日本國內聲名遠播的漢文體中國遊記，傳頌一時，且在中國亦見流通。參見（日）竹添進一郎著，張明杰整理《棧雲峽雨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8–9。1879年王韜從香港前取道上海搭輪船渡至日本前一日（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七、初八日，陽曆4月27日），偕女婿錢昕伯至友馬洋行，就見到了赴中國交涉通商事宜與琉球問題的竹添進一郎，兩人筆談甚契合（見《扶桑遊記》，頁9）。

濟，災情趨緩，助賑事宜告一段落，九月二十二日《朝野新聞》的〈支那救恤記事〉刊登了七月十三日由李鴻章親筆致竹添進一郎的謝狀全文，<sup>15</sup>後附有駐天津的日本領事池田寬治為文解說，均呈現了兩國朝野友邦情篤之一面。

與救災賑濟新聞約略同一時期，《朝野新聞》亦屢刊出清廷正副公使與日本各界名流與漢學家贈答的詩歌作品，呈現出清廷使節團數月間與各方文士聚會筆談與往來酬唱的情景。時值幕府垮台後新政實行恰滿十年，日本社會雖已逐漸轉向學步西洋的文化氛圍，但兩國間尚未直接發生衝突，深遠的歷史淵源使得仰慕中國文化的傾向仍盛行，故一般社會對中國官員與文人相當尊重。清廷正式派使駐節打破了過去德川幕府的鎖國局面，也改變了此前東渡寓日的華人文士<sup>16</sup>多以書畫造詣享譽日本文人圈，往來文會、侍宴酬和、題字繪畫或評詩的情形。相較之下，造詣深厚的清國使臣，更受到喜好漢文漢詩的日本文士們仰慕，因此清使館於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明治十一年一月）在東京芝山的月界禪院設駐後，經常有各界名流文士造訪求見，使節成員屢屢受邀至官方與民間的文酒詩筵，與朝野公卿布衣的交流益發頻繁而深入。學界便是著眼於此歷史脈絡，將日本漢學家石川英（1833–1918，字君華，號鴻齋）所編的《芝山一笑》詩文集視之為見證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嶄新扉頁。

有別於其他散見清使詩文的期刊或文集，<sup>17</sup>此書為何如璋等八名公使團成員<sup>18</sup>及寓日清人王治本、王藩清，與石川往來贈答的詩歌「專集」。且該書在公使抵日不到一年（明治十一年八月），即由東京文昇堂出版，內收近八十首詩、書一封，書末有日本名士與漢學家十一人所撰跋文，<sup>19</sup>堪稱為最早出版的清使與日人唱和的詩文專集，為公使團在東京駐節的初期歲月留下清晰剪影。

<sup>15</sup> 李鴻章文中強調「……曩以賜雨不時，饑饉荐臻。貴國大夫，不吝重貲。為泛舟輸粟之舉，擴監河借潤之情……。執事復以經心緯之果力行之，枯養瘠，煦濡群萌。雖孔聖所謂老安少懷，孟氏所謂惻隱怵惕，何以尚茲？……」，盛讚竹添進一郎代表日方朝野人士至中國賑恤，且親自監督捐款流向與施放米糧開設粥廠狀況，勤奮敦敏，不敢稍懈，務使善款全數施用於救災撫恤。見明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朝野新聞》第二頁。

<sup>16</sup> 如葉燁（松石）、陳鴻誥（曼壽）、王治本（漆園）、王藩清（琴仙）、衛鑄生，以及書法家張滋昉。參見王寶平：〈前言：試論清末中日詩文往來〉，收入王寶平主編：《晚清東遊日記匯編「中日詩文交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6。

<sup>17</sup> 如中村敬字主編的《文學雜誌》和漢學家森春濤主編的《新文詩》、《新文詩別集》中，也可散見清使成員的作品。如何如璋〈次長岡公使原韻即以爲別〉便刊登在《新文詩》第六十一集。見王寶平：〈前言：試論清末中日詩文往來〉，頁8。出處同上注。

<sup>18</sup> 該書序言第一篇由沈文熒所撰，第二篇作者為王治本，後序則為源桂閣。何如璋的么弟何子綸以隸書體題名「芝山一笑」，頁左畫出兩株靈芝仙草，彰顯書名意旨。卷首〈後序〉文後列出使團成員何如璋、張斯桂、沈文熒、黃遵憲、劉壽鏗（神戶理事）、廖錫恩（字樞仙，為隨員之一）、潘任邦（隨員之一）、何定求（字子綸）、王治本、王藩清共十位官銜與名字。見《晚清東遊日記匯編「中日詩文交流集」·芝山一笑》，頁59–63。

<sup>19</sup> 包括徹定、僧義兩和尚、西洋史學家岡千仞、清史專家增田貢、文學家龜谷行、漢學家森春濤…等人，見《芝山一笑》，頁73–75。

若對照《朝野新聞》，我們更會發現，收入《芝山一笑》詩歌中的第一組：石川英各題贈公使何如璋與副使張斯桂的兩首七律（共計四首詩），以及當日何與張的贈答詩（各二首七律，共計四首），共八首詩歌之原作，<sup>20</sup>早在明治十一年四月卅日的《朝野新聞》中便已刊出。十二天以後，即五月十二日，《朝野新聞》上又刊出石川氏〈再疊前韻呈欽差大臣何公〉、〈再步前韻呈副使張公〉兩詩，詩中提及日前偕兩位住持和尚（知恩院徹定、天德寺義應）同行來訪，故被副使張斯桂誤認三位來客皆為僧一事，修書自辯，並作詩調侃解嘲。當天亦刊出張斯桂贈答之七律兩首，笑談前日僧俗莫辨之誤識，有「謬呼名士為開士，漫說文心為佛心」之句。此錯認為僧，雙方解頤的公案即為《芝山一笑》書名由來，當日刊登在報上的這四首詩，便為收入該書的第二組贈答詩歌。

有趣的是，往前翻閱較早的報紙內容，可知天德寺僧人義應亦工詩，各有一首七律分贈正副公使，何張二使亦作詩酬答，這四首詩刊登在四月廿五日的《朝野新聞》中，生動地呈現了二僧一俗訪客與清使「以文會友」的實況。但這些詩歌並未收入《芝山一笑》中，權可作為該書逸史之外一章，收「補闕」之效。當日亦在座中的參贊黃遵憲，亦有收入《芝山一笑》題為〈石川先生以張星使之誤為僧也來告予曰近者友人皆呼我為假佛印願作一詩以解嘲因戲成此篇想閱之者更當拍掌大笑也〉的七言長詩，即指此事。該詩經斟酌修改後，易題為〈石川鴻齋英偕僧來謁張副使誤為僧鴻齋作詩自辯余賦此以解嘲〉，<sup>21</sup>後收入黃晚年詩集《人境廬詩草》卷三中，<sup>22</sup>均可幫助我們還原當日時空語境。這些報章文獻所釋放的訊息，說明了《芝山一笑》結集成書的四個月前，東京的新聞紙已率先刊出清國正副公使與本地名流酬唱的詩歌，彷彿向讀者預告著：新式傳媒將在第一時間為中日交流的新序章寫照傳神。

當時報紙披露出的消息與日本文士所編撰的詩文集，皆可見不管是轉載來自入華使者或上海《申報》的新聞，或紀錄使臣在日參與詩社文會活動的漢文詩歌，<sup>23</sup>日報上的相關消息均可見兩國關係大體維持和睦。但這個狀況到了明治十二年三、四月間，漸漸有了變化，當時日本政府對一向為中國藩屬國的琉球施加壓力，廢除了琉球藩，改為沖繩縣，並禁止其國王向清國朝貢。使得此前（1871-1874）因琉球漁民漂流到台灣遭牡丹社生番殺害事件而導致中日間外交齟齬，經英公使威瑪妥（Thomas

<sup>20</sup> 對照新聞紙中所登載的詩歌，可知這八首詩歌，均經過作者將原詩修改更動後，才收入集中，可見慎重。（見《芝山一笑》，頁63-64）

<sup>21</sup> 見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93。

<sup>22</sup> 此集在黃生前親自哀集定稿，逝世後由其弟黃遵楷初印（1911），後屢經翻印。參見上注，頁67-70。

<sup>23</sup> 《朝野新聞》明治十二年一月三十一、四月八日，仍可見何如璋、張斯桂與日本文士如兒玉奎卿與源氏後人源輝聲唱和的詩歌。寓日多年的書畫家，後來成為清公使團成員的王治本（黍園）、王藩清（琴仙）兩位同族昆仲亦常在座中聚會，其詩歌唱和屢見於報章。

Francis Wade, 1818–1895) 調解而逐漸平息爭議的狀態，<sup>24</sup> 一度轉為尖銳緊張。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駐日公使何如璋對此提出強烈抗議，<sup>25</sup> 但日方政府態度強硬，一時不見妥協跡象，報紙投書者的往來辯難已有濃濃火藥味，<sup>26</sup> 種種跡象，都顯出明治維新政權留心於隸屬於中國朝貢體系的海外藩屬之動向。<sup>27</sup>

在此情境下，《朝野新聞》「海外新聞」欄除了報導來自上海的《申報》內容外，亦可見轉載王韜在香港創立的中文日報《循環日報》(1874年創立)的消息。如明治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日連續兩則皆標明為「循環日報抄譯」的〈越南の騷擾〉即為一例。此文提及粵匪李揚材竄入越南滋擾其境，使多年來企圖侵占越南版圖的法國，經營海外殖民地的政策變數遽增，揭示出與西南邊疆毗連的中國藩屬國，正逐步陷入瓜分危機與國際角力中。《循環日報》作為《朝野新聞》登載海外新聞與鳥瞰中日交涉史過程的一扇窗口，也益發明晰起來。

## 二、文化映鏡裡的文明開化新氣象

抄譯自《循環日報》的內容除中國藩屬國的時事動態與國際新聞外，更可注意的

<sup>24</sup> 王韜在香港期間於《循環日報》上發表不少日本出兵台灣的評論，且集錄十六篇〈台灣番社風俗考〉凡十六篇(見《循環日報》1874年8月6日〈台灣番社風俗考十六〉文末天南遯窟老民識語；另經筆者考證，載於《循環日報》1874年7月20日〈台灣番社風俗考十四〉後由王錫祺節錄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正編》第九帙〈台灣番社考〉中，惟著者處標示為「鄺其照錄」)，並由上海《申報》轉載(1874年5月12日、13日，1879年8月11日)；又如〈論日本舉事之謬〉(1874年8月10日)、〈論日本侵犯台灣事〉(1880年11月15日)、〈辨琉球屬於我朝〉(1880年11月15日)、〈論日本經營琉球〉(1881年12月30日)等文章，均批判日本強行出兵台灣與重申中國作為琉球宗主國的觀點。參見(日)西里喜行著，鄭海麟譯：〈關於王韜和《循環日報》〉，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十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0)，頁282–300；亦參見西里喜行著，胡連成等譯，胡連成終校，王曉秋審校：《清末中琉關係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570–572。

<sup>25</sup> (日)佐藤三郎著，徐靜波、李建云譯：《近代中日交涉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5–10。

<sup>26</sup> 如明治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有寓日華人投書，以長詩對沖繩事發表議論，詩中譴責日方強佔清朝藩屬之舉，詩末有「君不見無禮之國不義人，吾儕不與之相親」句，可見憤懣之情。兩週後(六月十三日)即有署名為「麴街大村拔山」的兩首七言長詩，題名〈讀貴社新聞紙上第七百十三號所載某氏詩不堪忿惋因次其韻二首請記者先生貸其餘日以示之原作者幸甚矣〉反擊前文。

<sup>27</sup> 明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朝野新聞》有日本專管琉球事務的外務省官員、前薩摩藩藩士伊地知恒庵所著，任修史館編修的重野成齋所閱《沖繩志》書籍廣告；明治十二年十月廿一日《朝野新聞》幾乎可稱為琉球一事中日交涉往來的專題報導，清廷的談判代表恭親王與日本外務大臣往來協商過程，「論說」欄詳述此事葛藤之來龍去脈，可窺社會大眾強烈關注之一斑。

是，駐日使節團一行人以詩歌體錄下派駐期間觀察所得的作品，因曾刊登在《循環日報》上，也引起了《朝野新聞》轉載的興趣。如明治十二年五月四日該報刊出副史張斯桂吟詠東京之四首七絕詩，名之為《使東詩錄》，<sup>28</sup>就捕捉了日本首善之都現代化轉型的城市新風貌。

從時間點來看，輔以《扶桑遊記》所載日記相對照，張斯桂四首以東京為題的七律詩刊出那天，恰恰是王韜受邀赴日，從香港出發，道經上海，搭乘輪船抵達長崎、赤馬關（即下關），甫駐神戶之時。精確的說是他踏入日本國土（四月三十日夜半）後第四天。王韜在神戶與香港舊識（曾助他輯譯《普法戰紀》的張芝軒、吳廣霈）、長崎領事廖樞仙相聚甚歡，一行人隨後乘輪車（火車）前往大阪與京都參觀博覽會後，復搭船經由水路抵橫濱，五月十七日正式抵達東京，隨即前往謁見何如璋、張斯桂與黃遵憲等使節團成員。<sup>29</sup>在王韜落腳東京的隔天，即五月十八日《朝野新聞》，復見轉載自《循環日報》，名為〈東京雜詩〉六首七絕詩（標題指出作者為「支那使臣張斯桂氏」），<sup>30</sup>該不是偶然。六日後刊出〈張斯桂氏東京雜詩之續〉六首七絕（五月二十四日），<sup>31</sup>隔三天（五月二十八日）亦見後續張氏七首七絕詩。若再對照當時中國上海英租界的第一大中文報《申報》，會發現張氏《使東詩錄》系列詩歌早已陸續刊出，<sup>32</sup>可以說，此組詩作不啻為上海/香港/東京三城報刊界已形成靈活的訊息流通網絡並傳遞遠播的明證。

已有學者指出何如璋《詩東略述並雜詠》、張斯桂《使東詩錄》所收詩歌率先介紹了一批日本創制的新名詞，公認為「新語入華」的濫觴，改變並影響了近代華語的詞彙構成，在晚清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sup>33</sup>但若將刊載於三城報紙所呈現的亞際流通網絡考慮進去，張斯桂出使期間所寫下的一系列詩歌卻值得從連載到印行探究其來龍去脈。按目前常見的《使東詩錄》乃收入王錫祺所編輿地叢書《小方壺齋叢書四集》之版本，共收詩歌共四十首，光緒癸巳年王氏於該詩集的編後

<sup>28</sup> 《朝野新聞》中首次錄出此組詩歌之標題為：〈循環日報ニ使東詩錄ト題シ支那公使一行中ノ人カ作りシ詩ヲ載ヤタリ左ニ錄出ス〉。

<sup>30</sup> 這些七絕詩分別在詩題後作題注，加以解釋或存疑，如：〈釣道具（買釣魚鉤舖子猶言釣魚一道之器也）〉、〈四海波（酒名也）〉、〈八百屋（蔬菜店未詳何義）〉、〈御料理（御者大也料理猶言善治庖者）〉、〈仙臺味噌（仙臺地名味噌者醬醃鹹菜等類也）〉、〈荒物類（荒物草器也）〉。

<sup>31</sup> 分別為：〈玉子場（玉子雞卵也場買處也）〉、〈古帳買賣（古賬破碎舊紙用做還魂紙其整張者分與各舖以包什物）〉、〈御入齒（鑲配牙齒亦西法也）〉、〈彈擊所〉、〈楊弓店〉（髮鈹處（鈹剪也剪髮之匠也））。

<sup>32</sup> 《申報》1879年4月2-9日刊出。相關論述參見夏曉虹：〈黃遵憲與《申報》追蹤〉，見氏著：《晚清上海片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15-116。

<sup>33</sup> 見馮天瑜：〈清末民初國人對新語入華的反應〉，收入《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8月號，頁44-52；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99-201；207、213。

跋文中，特別提到他心目中第一代使東詩歌集之「三絕」（其他兩集指何如璋《使東略述並雜詠》與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此終可全數傳鈔付梓，實現多年心願。此乃因「何著《使東述略》與《使東雜詠》，坊間有刊本；黃著《日本雜事詩》，長洲王韜以聚珍版印之；<sup>34</sup>張著獨未見」。<sup>35</sup>雖然王氏並沒有交代他是如何得到詩集文稿，但卻透露了《小方壺齋叢書四集》出版之前，這部詩集的內容鮮有讀者得窺全豹。

佐證《申報》與《朝野新聞》報章文獻，輔以王氏說法，說明張斯桂《使東詩錄》自報紙刊載後歷經長達十四年後才印行出版，在1870年代末的刊印流通似乎遠比不上其他幾部使東詩集。但經過報刊文獻資料重建「原生態」歷史語境卻恰恰推翻上述說法，而得出更貼近真實的推論：張斯桂任職日本使節期間，他的一系列東京見聞詩歌已由上海《申報》及老友王韜<sup>36</sup>在其主持的香港《循環日報》上刊出，其後更由東京《朝野新聞》持續連載多日，總數多達二十三首。張之詩歌於當時的東亞三城著名報刊轉載流通，其影響力允稱晚清使東詩集箇中翹楚。

故在《朝野新聞》「故紙」堆中鉤沉的這組詩歌，彌足珍貴地體現1870年代末晚清時期東亞世界報刊暢行的跨域流通網絡，再次揭示「先聲奪人」的報刊媒體在跨文化融匯過程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一任駐日公使團的幾部扶桑見聞錄，不僅是當時中國開明之士了解東瀛的重要渠道，當時東京報刊界刊登印行這些詩歌與文集之流通接受過程，也說明了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朝野文士亟欲透過「他人之眼」觀照自身的心態剖面，張之詩集也扮演了文化映鏡的重要角色，折射出正處於文化轉渡期的中日菁英社群面對洋風壟罩的城市風貌之複雜心境。

將目光聚焦張斯桂《使東詩錄》，映入讀者眼簾的是日本京畿之地推行明治新政逾十年而氣象一新的時代剖面。張斯桂以「東京」為題及〈東京雜詠〉等系列七絕詩如一組風俗畫般呈現首善之都的東京市井百態。<sup>37</sup>〈游東京街市〉云：

<sup>34</sup> 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1879年曾於香港由主持《循環日報》的王韜以活字排印，不久後也有京師譯館的刻本流通。王韜：〈《日本雜事詩》序〉，見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208–210；翻閱相關報紙，1880年5月17日（光緒六年四月九日）至5月31日香港《循環日報》上有中華印務總局所刊《日本雜事詩》出版告白（可證上文所謂王韜以活字排印此書一事）；明治十三年（1880）六月一日起，《朝野新聞》（第四頁第三欄）亦見東京文芸堂出版《日本雜事詩》的書籍廣告。均可窺該書在香港、日本流通狀況之一隅。

<sup>35</sup> 見〈《使東詩錄》跋〉，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III」·甲午戰前日本遊記五種》，頁153。

<sup>36</sup> 王韜在《扶桑遊記》中載抵達東京即前往拜謁公使成員，第一次提到張斯桂就介紹他是二十年的故交：「張公字魯生名斯桂。張公於滬上曾識一面，一別二十年矣。日月荏苒，殊不可恃。時張公方銳意為西學，欲刻海甯李壬叔天算諸書。其作《萬國公法》序，指陳歐洲形勢，瞭然如掌上螺紋，以春秋列國比歐洲，此論實由公」。見《扶桑遊記》，頁40。

<sup>37</sup> 見明治十二年五月四日《朝野新聞》。

細白泥沙一路平，大街十字任縱橫。人無男女皆裙屐，門有留題盡姓名。矮戶礙眉僂偃入，小車代步往來輕。沿途少婦雙趺白，襁負嬰兒得得行。

詩人或搭車或行走於平坦馬路的十字街頭，舉目可見新舊建築錯落交雜的城市景觀，代步的「小車」則是指近十年前創制卻快速普及的人力車，方便往來於馬車不能通行的小徑，亦比轎子迅捷許多。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對人力車亦有過不少讚美詩文，已有研究者深入分析，<sup>38</sup>可見公使團一行人在「文明開化」的氛圍中，眼見目睹東京街景因歐化文明器物的引進而添增新鮮樣貌。另三首〈東京男子〉、<sup>39</sup>〈東京女子〉、<sup>40</sup>〈東京婦人〉<sup>41</sup>詩，呈現出歌詠日本奇風異俗的洋溢詩思。

如前文所提及，此組詩歌描繪了東京商業繁榮、店家林立的情景，泰西文明的輸入不僅改變了街景市容的情況，亦出現了冠上新詞彙的店家招牌與嶄新行業。過往以漢字文化圈為核心的東亞世界在西力東漸下，必須另創新詞，方能將不斷冒出新鮮事物的日常生活情境形容盡致，新創的語彙在此情境下應運而生，在現代漢語上留下深刻印痕，呈現出共同面對西方挑戰的亞際文化轉型的過渡期特徵。茲舉隅數條如下：

#### 彈擊所

泥丸一粒豆同紅，裝入神槍小鐵筒。謝却硝磺煙火氣，勁風賴有大王雄。

#### 御入齒（鑲配牙齒 亦西法也）<sup>42</sup>

動搖四十悵昌黎，老去多嫌齒不齊。殘缺可將人巧補，瓠犀不讓衛侯妻。

<sup>38</sup> 明治三年（1870年）高山幸之助於日本橫濱創制人力車，很快成為日本「文明開化」重要的物質表徵。1873年春，從日本來華的法人梅納爾首次把人力車這種新式的交通工具引進了上海，向法租界公董局提出設立人力車運輸機構，並申請為期十年的專利經營，隔年（1874年）此方案獲得批准後，使英、法兩租界當局獲利甚夥，作為一種輕便價廉的交通工具，人力車在上海遂迅速發展起來。相關論述參見夏曉虹：〈一悲一喜人力車 新詩題之四〉，收入《詩界十記》（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頁37-38；（法）梅朋（Ch. B.-Maybon）、傅立德（Jean Fredet）著，倪靜蘭譯：《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頁320-321。

<sup>39</sup> 〈東京男子〉：「男兒膏沐首如蓬，鬢髮長留頂髮空。得得數聲高木屐，纖纖一握小煙筒。呼童拍手輕於板，對客低頭曲似弓。畢竟妍媸容易辨，雄風原不及雌風。」

<sup>40</sup> 〈東京女子〉：「犀齒蛾眉鬥曉妝（女子未嫁皆修眉皓齒已嫁則否），小姑猶未嫁彭郎。披襟不掩金訶子，曳屐如行響屨廊。如意鴉雲螺不髻（女子梳頭皆如意式襟不得挽髻），拂胸蝶粉（女子皆露胸故自頸至胸皆傅粉甚白然粉粗而劣不及中國宮粉之香李商隱詩拂胸資蝶粉）麝無香。等閒親試蘭湯浴，笑問人前卸綉裳。」

<sup>41</sup> 〈東京婦人〉：「省識東鄰解語花，容顏皎若散朝霞。嬰兒襁負娘裙屐，宮眷髮垂俗髻丫。歸妹及期眉顰豹，使君有婦齒塗鴉（婦人已嫁則眉皆薙落齒皆涅黑）。客來席地郎陪坐，親捧杯盤跪獻茶。」

<sup>42</sup> 〈詠御入齒〉一詩亦曾刊載於中村敬字所主持的《文學雜誌》第七十號，亦可證張斯桂之詩歌流傳於東京文藝界。參見《晚清東遊日記匯編「中日詩文交流集」》，頁8。

髮缺處(缺剪也 剪髮之匠也)

照鏡鬚眉喜氣添，到門休笑髮鬢鬢。手持燕尾并州翦，翦取烏絲寸寸纖。

御泊宿(小客寓也)<sup>43</sup>

門前潮落泊征橈，茅店頻將過客招。行李暫停人暫宿，圍爐且度可憐宵。

仕立處(成衣鋪也)

纔停金剪度金鍼，密密縫來寸寸心。差喜日長添一綫，製成稱體好衣襟。

不管是宿泊、仕立等等詞彙的解釋，或是洋鎗射擊場、以西法鑲配假牙的「御入齒」技術、男子髮型於新政後已效歐美剪成短髮，東京街頭紛紛出現剪髮店、標榜量身訂製的成衣商店，都呈顯了明治新政後東京城的新樣貌，冠以「文明開化」之詞遂成風潮，<sup>44</sup>紀錄了社會風氣轉移變動的軌跡。

明治新政提倡效法西式教育，明治皇后更以皇家之力創辦女子學堂，公使團成員考察日本學校機構時，特別注意到女子教育的普遍。明治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朝野新聞》刊有張斯桂贈與日本最早創辦女子學校的跡見花谿(名「瀧」)女士一詩(〈贈跡見女學校主講花谿女師〉)。如下：

新栽桃李滿庭除，桃李穠時尚讀書(女弟子年多及笄)。紅粉兩行陳學士，絳紗一帳女相如，漫薰蘭麝董班馬(女弟子多讀日本外史)。不羨鴛鴦羨蠹魚。更有餘閒添書稿，丹青點染寫芙蕖。

該詩雖未收入《使東詩錄》一書中，但與其所收〈女子師範學校〉一詩並觀之，相映成趣：

滿庭桃李不勝春，都是羅敷未嫁身；西邸簪花多妙格，東鄰詠絮有佳人(多半講求漢學)；薛媛畫筆添毫細，蔡女琴弦按拍新(畫理琴歌，考尚西法)；戲罷鞦韆無个事，綠紗窗下度針神。<sup>45</sup>

兩詩中均提到該女校中西合璧的教學課程，女學生擅丹青，學西樂，讀外史，繪地圖，也兼顧代表東方婦德的女紅。再更深入橫向考察，我們會發現除自創女學外，跡見花谿亦曾任教於著名學者中村正直(號敬宇，曾留學英國)所創辦的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sup>46</sup>(今御茶水女子大學)，乃明治時期著名閨秀畫家，能詩文，善書

<sup>43</sup> 此條並未收入1893年「小方壺齋叢書」所印行的《使東詩錄》中。

<sup>44</sup> 明治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朝野新聞》書籍廣告欄可見渡邊修次郎著《明治開化史》一書出版。考察此時日本社會的文化氛圍，歐洲傳來的「文明史學」幾乎占領整個日本文壇，一般大眾更以「文明開化」是尚。參見鮑紹麟：《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106。

<sup>45</sup> 見《使東詩錄》，頁147。

<sup>46</sup> 王韜《扶桑遊記》記陽曆五月二十九日與中日友人集於万千樓，座中即有中村正直，王韜提及其在維新後「政府特起之，攝理師範學校」，見《扶桑遊記》，頁81-81。

畫。與清國公使團成員張斯桂與黃遵憲頗有往來。<sup>47</sup>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亦有〈女子師範〉詩：

深院梧桐養鳳凰，牙簽錦悅沐恩光；繡衣照路鸞輿降，早有雛姬掃玉床。<sup>48</sup>

該詩下注云此師範學校是由皇后出資創辦，故有「鸞輿降」語。皇家下令擇士族與華族之女百人，延師教導。緊接著下一首〈女學生〉亦描述了女子學堂景觀：

捧書長跪藉紅氈，吟罷拈針弄繡襦；歸向爺娘索花果，偷閒鈎出地球圖。<sup>49</sup>

此詩下注有云：

女子師範學校，亦多治西學，而有女紅一業。謂婦工居四德之一也。曹大家《女誡》亦有譯本。校中等及次第，大略與中學相同。若宣文絳紗、私自授業者，亦往往而有。有迹見瀧教女弟子凡一二百人，頗有五六歲能作書畫者。

黃遵憲於出使日本期間即著手編撰《日本國志》，在〈學術志〉中即詳細介紹日本現代師範教育的淵源與施行狀況，其中有明治十年對全國教師與男女學生進行調查的統計數字。<sup>50</sup>雖然比不上男性教師（6萬3千餘）與男學生（162萬7千餘）的人數，但上千名女教師以及在總數220萬餘學生中佔有57萬餘名的女學生人數，委實可觀，可知日本政府在教育上廣納外交官與專研西學的知識菁英建言，並致力實踐的豐碩成效。<sup>51</sup>

另，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畫法〉一詩言及跡見花蹊在明治畫壇的地位：

掀翻院體好新奇，爭訪南蘋老畫師。近世蛾眉工潑墨，寫花曾不買胭脂。<sup>52</sup>

下注文便提及跡見花蹊妙寫丹青，得蘇州畫家江稼圃真傳，並遙師鄭板橋，為馳名一時的女書畫家。<sup>53</sup>

<sup>47</sup> 參見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頁79。

<sup>48</sup> 見《日本雜事詩》，頁653。

<sup>49</sup> 同上注，頁654。

<sup>50</sup> 為：「全國教員凡六萬二千一百七十名，其中六萬三百四為男子，一千八百六十六為女子；生徒凡二百二十萬三千五十名，其中一百六十二萬七千九百三十八名為男子，五十七萬五千一百十二名為女子云」。見黃遵憲：〈學術志〉，見氏著：《日本國志》（「據光緒十六年羊城富文齋刊版」經點校整理印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812。

<sup>51</sup> 「女學校，以教婦職」。下注云：「多習纂組縫紉之工，并及音樂。初，開拓次官黑田清龍歸自美國，極陳教育婦女之要。政府從其言，選女子五名，命以官費留學美國；又於東京設女子師範學校。其後各地慕效，女學校益多」。見《日本國志》，頁799。

<sup>52</sup> 黃氏曾修改過此詩，故本文以初印本所載原詩為準。見《日本雜事詩》，頁763-764。

值得注意的是，王韜在東京時曾在友人余元眉書房見到跡見畫作，但始終與她緣慳一面，故並沒有記錄在他的日記《扶桑遊記》中，但這位無論在杏壇或是畫壇堪稱雙傑的女性，在他心中已留下深刻印象。光緒十年（1884）自香港返滬後不久，王韜即在申報館創辦的《點石齋畫報》第六期上開始刊登他的筆記小說《淞隱漫錄》長達數年，其中一則〈花蹊女史小傳〉，描述的便是跡見瀧在東京教育界與書畫圈成名的傳奇故事，文末有讚語：

女史以一巾幗，名達天關，華族貴人，咸執弟子禮，西洋數萬里外之人，亦知愛重其筆墨，令女就學焉，豈不盛哉！如女史者，可不謂曠世之奇女子乎哉！<sup>54</sup>

相對照晚清的女學堂到了1890年代才有了標誌性里程碑：曾任《上海新報》主編、創辦《教會新報》的林樂知（John Allen Young, 1836–1907）在上海創辦了中西女塾，課程內容亦中西兼備，可它究竟是美國傳教士所創辦的學堂。1898年，第一所由華人（經元善）自辦的中國女學才正式在上海成立，學堂內開設的功課中西合璧，<sup>55</sup>頗能彰顯泰西女學的核心精神。脈絡化梳理中國女學的創辦過程，方能明白清公使團成員以及有過歐洲經驗的王韜在1870年代末葉見證日本女學昌盛所感受到的震撼。曾遊歷西洋，與在東瀛蒐羅的奇聞異事化為王韜筆下的海外傳奇，此奇女子形象正映現了晚清時期知識菁英與東西洋文化對話交匯的時代面容，進一步開拓了上海讀者的視野。張斯桂、黃遵憲與王韜皆曾於詩文小說中向跡見花谿致意再三，均體現了1870年代亞際菁英社群關注日本社會突破傳統性別藩籬之過渡期文化剖面。

明治十三年二月五日《朝野新聞》，又刊出了〈清國副使張君近作〉四首詩，注明為張斯桂去年歲末在東京節署所作。分別吟詠「火輪車」、「電信局」、<sup>56</sup>「煤氣燈」、<sup>57</sup>「新燧社」（火柴<sup>58</sup>公司名），可視為近代東亞漢文化圈以舊體詩寫新事物極富代表性的例證。此組詩歌在五個月後亦轉載於上海《申報》（1880年7月5日）上，題為〈日本

<sup>53</sup> 見《日本雜事詩》，頁764。

<sup>54</sup> 見王韜：《淞隱漫錄》（台北：廣文書局，1976），頁452。

<sup>55</sup> 課程有英語、算術、地理、圖畫、醫學、中文（內容包括：《女孝經》、《女四書》、《幼學須知句解》、《內則衍義》、唐詩、古文）、女紅、體操、琴學等。參見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頁20–26。

<sup>56</sup> 詩云：金鐘一打（傳信時先以電氣打鐘令彼處接信人警覺以便聽候接遞也）報君知（瞽者賣卜手攜一圓板敲之有聲名曰報君知），萬里馳書晷不移。插架道傍排雁柱。結繩竿上罨蛛絲。足音如奏無聲樂（傳信時只有輪轉而無聲音），手簡翻來沒字碑。（信來祇有點數而無字跡）漫說置郵傳命速，鱗鴻飛遞總遲遲。

<sup>57</sup> 詩云：離奇燈火影橫斜，照徹通衢十萬家。一路金莖爭吐豔，滿街鐵樹盡開花。淚無蠟滴明于月，氣有龍嘯燦若霞。看到千枝蟠曲處，風來夭矯走金蛇。

<sup>58</sup> 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淡巴菰〉一詩中云「柳燧」即為火柴，見《日本雜事詩》，頁719。

西法四詠》，令人聯想到本文第一節曾提及《芝山一笑》（明治十一年八月出版）詩文集，收有張斯桂的〈觀輕氣球詩〉<sup>59</sup>與石川英次韻唱和<sup>60</sup>的七古長詩，前者即曾由《申報》轉載。<sup>61</sup>儘管它們在《芝山一笑》這部標榜古典風雅情調的集中略顯突兀，卻鮮明捕捉了張斯桂熱衷考察日本社會廣泛運用西洋器物於日用民生的身影。

張在國內時即以洋務幹才著稱，故不管是電信局、煤氣燈，在張並不陌生；至於對輕氣球的濃厚興趣，估計可能來自《教會新報》，<sup>62</sup>或王韜《普法戰紀》那段法國大臣甘必大乘氣球穿越戰線的知名敘述而來，<sup>63</sup>可畢竟未曾親睹。從這些詩歌內容不難想見，張出使日本期間更著意留心的是在國內未曾體驗的乘坐「火輪車」經驗，現場觀察日人效西法所製的輕氣球，以及參觀火柴工廠，<sup>64</sup>感受數年前才出現的火柴迅速成為日常用品，大幅改善庶民生活景象。詩中描述這些新事物的普及程度時，流洩讚嘆之情：

#### 觀輕氣球詩（節錄）

天空遼闊天宇高，誰能振翮去翔翱。泰西氣球新樣巧，軒軒霞舉輕鴻毛。扶桑國裡初學製，一球中徑三丈計。剪穀為衣包舉周，結繩為網網維細。下繫錦繡復藤牀，中坐一人雙旆揚。排空御氣騰騰起，須臾直上白雲鄉……

#### 火輪車

器車一輛獨參前，十輛安車節節連。循軌不虞輿脫輻（鉄軌車輪兩相吻合勿使

<sup>59</sup> 見《芝山一笑》，頁71。

<sup>60</sup> 石川之詩「……聞說洋人始新制，圖敵瞰營施奇技。或歷宇內檢廣狹，又閱輿地極細微。飄渺空際踞一床，下視塵土氣揚揚。……」，出處同上注。

<sup>61</sup> 該長詩描述參觀施放熱氣球之感，考察何如璋《使東述略》、《雜詠》，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均未述及在日期間的相同經驗。大約是因為黃遵憲1870年過香港即已見過熱氣球，曾有「御氣球千尺，馳風百馬驍」（〈香港感懷〉其八）的詩句寫下感想，故不覺稀奇（見《黃遵憲全集·人境廬詩草》卷一，頁78）。張赴日前從未親眼目睹，因而興致勃勃，且著意留心觀察日人工藝的精巧程度。另值得注意的是，此詩曾以〈陸軍省士官學校觀輕氣球〉為題刊登於《申報》（1879年4月9日）上，題名為〈使東詩錄〉，錄於〈西歷元宵東京府知事邀往三井銀行觀劇 是夕各國公使 日國巨卿大賈咸集 主人索詩 作此以贈之〉長詩之後同時刊出。但王錫祺所輯《小方壺齋叢書·使東詩錄》未收錄此二首長詩。

<sup>62</sup> 見1868年12月《教會新報》，〈輕氣球圖〉。

<sup>63</sup> 《普法戰紀》中亦有多處強調輕氣球偵察敵情的軍事用途，見《普法戰紀》（大阪：脩道館，1887）卷五，頁六至七；頁十五至十六。

<sup>64</sup> 明治八年（1875）清水誠於東京創立「新燧社」火柴公司，後外銷香港上海，獲利無算。王韜在《扶桑遊記》五月二十二日（陽曆七月十一日）中曾記載參觀1878年祝融後重建的火柴工廠「新燧社」，乃時人目為「國中巨擘」的大企業之一，其廠房景觀為：「屋宇深廣，工作八百餘人，婦女居多，截木作條，車凡十架。熬煮硫磺爐竈，悉用西法，暫入一處，已覺氣不可向邇。製匣裝貯，悉以女工，運售於香港上海，年終不知凡幾」（《扶桑遊記》，頁164），據此可推測張斯桂亦曾往觀在東京擁有巨大廠房的火柴工廠「新燧社」。

踰越)，御輪直擬箭離弦。巧爭牛馬木流上，開到驛驢道路先。從此飛騰來就日，教人難着祖生鞭。

#### 新燧社

剪斷條枝寸寸齊，靈丹圓裏一丸泥。枯枝入手遭□<sup>65</sup>竊，活火迎眸倏照犀。  
鑽燧不須春取柳，讀書容易夜燃藜。煎茶煖酒隨時便，石火流光再不題。

泰西科技創制的文明器物運用於軍事設備，並廣泛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衝擊舊有的時間與空間概念，詩人描述新事物時不得不轉化傳統漢文詩歌蘊藉情思，以涵容社會文化變遷軌跡，亦映現了明治文壇「新詩題」盛行的時代風尚：<sup>66</sup>傳統和歌的吟詠題材加入西洋的文明事物，轉而發微嶄新構思與詩情。《朝野新聞》刊出張氏四首詩歌，篇末還錄有報社主筆成島柳北大表敬服，稱賞其「新題目，新意匠，謝瞿所不夢視」的一段評語。<sup>67</sup>

成島柳北的評論，亦透露出新聞主筆對泰西文明見多識廣的報人風範。從柳北早年任職幕府將軍侍讀即大量閱讀西學書籍與學習歐洲語言的背景看來，他曾在明治五年（1872）赴歐美遊歷一年餘歸國後刊行的《航西雜詩》中提到搭乘輪船與火輪車的經驗：

#### 倫敦府雜詩二首

汽車煙接汽船煙，四望冥冥不見天，忽地長風來一掃，倫敦橋上夕陽妍。  
頂上晴雷腳底烟，一車入地一車天，中間吾亦車中客，驀過東西陌與阡。<sup>68</sup>

#### 三月十六日發巴里赴伊太利汽車中所得

客身遠逐汽烟飛，千里風光一望奇，來路未收紅旭影，前山已濺雨絲絲。<sup>69</sup>

這些詩中描繪泰西文明器物改善了城與城、城與鄉之間交通的情景，對明治五年（1872）才有第一條鐵路從東京新橋至橫濱間營運通車，<sup>70</sup>但並未普及的東京居民

<sup>65</sup> 按，新聞紙原版影印本漫漶不清，難以辨識字跡。

<sup>66</sup> 據彭恩華考察，明治時期新詩題歌集有佐佐木弘綱編《開化類題歌集》。堪稱代表作的有大久保忠保編《開化新詩題歌集》，初編成於明治十年（1877），收錄新題157個，二編刊行於明治十三年（1880），收錄新詩題177個，三編出版於明治十七年（1884），歌題數增加到221個。日本社會吸納西方科技文明並落實於一般大眾生活層面的迅捷程度，不難管窺。參見夏曉虹：《詩界十記》，頁5。

<sup>67</sup> 「意匠」亦為新詞，指構思、匠心之意。乃為何如璋在1877年撰《使東述略並雜詠》所介紹的日本名詞。參見馮天瑜：〈晚清民初國人對新語入華的反應〉，頁44-45。

<sup>68</sup> 見成島柳北，《航西雜詩》。收入成島柳北（著），小野湖山（校閱），成島復三郎（編）：《柳北詩鈔》（東京：博文館藏版「寸珍百種第三拾九編」，1894年），頁40。

<sup>69</sup> 同上注，頁36。

<sup>70</sup> 相關論述參見藤井明：〈嵩古香の『西游小品』（一）〉一文分析，載《埼玉短期大學研究紀要》第14號（2005年3月），頁145-148。

來說，無疑有耳目一新之感，其釋放出的泰西新世界氛圍，更在當時文壇中別開生面。<sup>71</sup>雖身為幕府遺臣堅守不仕新朝的原則，但成島柳北因長期任職報刊界，也曾在詩歌中對西方報刊結合現代化電信而能跨國隔洋迅速傳送精確消息，並付諸日報，發出讚嘆：

#### 傳信機

無聲無臭電馳奇，一線之絲達西陲，海外書來賴誰腳，空中筆在寫吾辭。交情時隔山河語，邊警豈緣烽燧知，千古鄉翁能取譬，置郵傳命太遲遲。<sup>72</sup>

乘坐火車，體會電報的迅捷精準之海外經驗，充分體現了物質文明如何徹底改變固有的時空觀，影響了整體社會的走向。再與前述清廷洋務派大臣張斯桂書寫東京市容的詩歌加以對照，復描繪出西化物質文明短短不到十年間已點點滴滴滲入東京市民日常圖景，逐步左右了人們的行為思想。綜觀中日文士這些「新詩題」詩歌吟詠新奇的雷同意象中，讀者似能嗅出一絲對西方科技文明大舉壓境的隱憂，詩中意象每每與古風映照而流瀉懷舊況味，依稀折射出亞際知識菁英在東西文化碰撞過程中思索自身定位的心態側影。

### 三、西洋史、東洋劇與報刊界的三城流通網

上一節所述張斯桂的〈東京雜詩〉刊出三天後，即明治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朝野新聞》，王韜的作品首次登場，側面顯示了王韜抵東京<sup>73</sup>居住約半月餘後，和文化圈名流與報刊界知識菁英往來的情形。這天刊出的詩文為王修書與清史專家增田岳陽一封，<sup>74</sup>說明四月六日（陽曆五月二十五日）王韜偕公使團成員張斯桂、王治本、

<sup>71</sup> 參見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140–142；Maeda Ai（前田愛）；trans. Matthew Fraleigh, “Ryuhoku in Paris,” In *Text and the City: Essays on Japanese Modernity*. Ed. James Fuji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p. 280–288。相關論述參見拙文：〈冶遊、城市史與文化傳譯：以王韜與成島柳北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4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12年1月），頁297–299。

<sup>72</sup> 《柳北詩鈔》，卷3，頁2–3。

<sup>73</sup> 據《扶桑遊記》載，王於三月二十八日（陽曆五月十七日）抵達東京。見《扶桑遊記》，頁40。

<sup>74</sup> 內容為：王韜〈與岳陽增田君書〉：「前讀清史學要，於同治元年。忽睹鄙名，驚喜交至。繼知出閣下手筆，則又感甚，因歎曰：此海外一知己也！自此臨風懷，時不能忘。顧溟渤迢遙，安能覲面於万里之外？今弟泛槎東遊，每見貴國文士，必詢閣下，作登堂之拜，行執贄之禮。乃文旆惠然枉臨，何幸如之？復讀大著，過蒙獎譽，初何敢當？主臣々々。弟甫里一逋客，天南一廢人，而在下，老境頹唐，於文字學問，殊無真得，不知閣下何所見，而推愛若是，至投縞紵？弟願附譜末，曷勝甚幸？（編者云，詢閣下之下，恐有脫字）」。

王藩清等人集於增田家聚會宴飲，王韜賦七律一首，<sup>75</sup>另有張斯桂和詩一首。<sup>76</sup>隔天（六月三日）報上連載前一日所刊聚會詩歌另三首：王治本和詩<sup>77</sup>以及增田岳陽贈答張與王的詩歌二首；<sup>78</sup>此後，王韜的消息與長詩在報紙上屢屢登載，說明了人才淵藪<sup>79</sup>的東京文化界對王氏其人其文的高度關注。

仔細對照王韜《扶桑遊記》四月六日（陽曆五月二十五日）前後日記內容，可知這場與日本著名的清史家增田貢晤面締交與後續往來之始，當在前一日（四月五日，陽曆五月二十四日）增田貢與寺田士弧、吉田易簡來拜會王韜時。按增田貢，字岳陽，曾著《清史攷要》，該書剖析晚清上海政局時提及王韜的貢獻，其文曰：

吳郡處士王韜，獻策曰：招募洋兵，人少餉費，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洋官領隊。平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西官率之以進，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効於行間。於是遂有洋槍隊之設，號為常勝軍。<sup>80</sup>

文中特別提出王韜上奏清廷的洋法練兵策之貢獻，故王韜感其知遇之情，引為海外知己。當天一群人（後來黃遵憲加入）共同造訪重野成齋（名安繹，時任修史館編修），然後相偕至後樂園一遊。

後樂園曾為江戶時代水戶藩侯源光國之邸，源氏曾開設史館（彰考館）於邸內，旁設園池，敬禮東渡流亡的明末遺臣朱之瑜（1600–1682，字魯嶼，日人稱「舜水先生」）為師，執弟子之禮，開啟日本文教之先聲。遊後樂園當天，王韜即作七律一

<sup>75</sup> 王韜〈四月六日，集於岳陽先生鳴謙齋。同集者，張魯生公使，王黍園、琴仙昆仲及余。主人先有呈公使詩，因步韻錄呈〉：「東去欣瞻海外輶（余至日本，先謁何張二公使），幾番治具辱相邀。廿年酒國虛清疊，百戰詩壇奪錦標（余與張公使二十年不相見，今公使已戒酒，而詩興猶豪）。作史雄才誰可敵？憂時壯志莫輕消。一家文字多嫻令，不獨羹湯手善調（岳陽先生一家皆識文字）」。

<sup>76</sup> 張斯桂〈次岳陽先生韻〉：「扶桑影裡駐星輶，雞黍蒙君故々邀。笑酌醇醪勤把盞，醉批清史看題標（席間出示清史攷要一書）。揮毫張旭雲烟落，拔劍王郎壘塊消（出示寶劍數口，王君紫詮拔觀之）。聊借一詩抒謝悃，自慚音韻未能調」。

<sup>77</sup> 王治本〈和岳陽先生玉韻〉「三年海角駐征輶，把酒頻將明月邀。快睹青編欽學識（先生修清史攷要），相逢墨水挹丰標（與先生初會墨水樓）。高吟每向閑中得，別恨卻從醉後消。更羨孟光能款客，銀魚玉膾必親調」。

<sup>78</sup> 增田岳陽〈魯生張公使見訪酒間賦贈〉：「手排藜藿駐軒輶，窮閭生輝倒屣邀。博望光華提玉節，伏波矍鑠想桐標。每聞塵教心胸爽，又接芝眉鄙吝消。今日東西一家等，南薰習々亦和調」；〈贈紫詮王詞宗〉：「獻策轅門拂海氛，曾無茅土報功勳。養成壯勇洋槍隊，收拾威嚴常勝軍。欲使鳳鳴向東日，忽看鵬翼負西雲。楚材晉用吾能解，江表偉人推此君」。

<sup>79</sup> 「日國人才，聚於東京，所見多不凡之士，而鹿門（按，指岡千仞）尤其矯矯者」，見《扶桑遊記》，頁47。

<sup>80</sup> 見《清史攷要》（東京：所平七，明治10〔1877〕年出版）卷之六，頁1b–2a；頁1b眉批：「王韜洋法練兵策」。

首，有「清風百世臣心苦，史筆千秋生面開」句，<sup>81</sup>推崇的便是朱舜水終生懷抱復明之心，逃亡異域後輾轉將漢土儒學東傳，並啟發了源光國著《大日本史》，體現新史觀。隔天（即陽曆五月二十五日），曾撰《清史逸話》的本多正納來訪王韜，午後，王先至清使館公署拜會後，偕副使張斯桂、王漆園與王琴仙這對堂兄弟至增田岳陽家，飲宴之餘，除觀賞主人收藏的朝鮮書畫，增田還出示他所撰《清史攷要》及珍藏的寶劍，王韜曾拔劍一觀。<sup>82</sup>賓主盡歡之餘詩興遄飛，即席往來贈答酬和，數日後這一組詩歌分兩天刊登在《朝野新聞》上。

對照《扶桑遊記》所收詩歌僅有七律三首，除遠不若《朝野新聞》連載兩天刊出的書一封詩五首之豐富外，報紙上中日這兩位著名「史家」之深度交往與筆談對話的生動形貌，在明治時期崇尚西學與撰著外國史熱潮的時代氛圍中，更饒富意義，有助我們鮮活感受1870年代末身兼大報社主筆與著名西洋史家雙重身分的王韜來訪日東京城，吸引各界人士前來筆談交流的情狀。

增田岳陽家宴詩歌刊出後不到兩周，即六月十五日《朝野新聞》第三頁「雜錄」一欄，有〈支那ノ新聞記者ノ給金多少〉一文刊出。該文語帶諧謔地評論傳聞云大報社《循環日報》社長王韜受聘赴日，酬薪僅為二百圓，委實甚寡。<sup>83</sup>將華人報社主筆的薪資與日本報社記者的待遇兩相比較，日本記者收入尚屬豐厚，宜當自豪云云。按《朝野新聞》主筆成島柳北以其在「雜錄」欄的辛辣時事評論著稱，<sup>84</sup>此文開篇直指中國之大，與日本相比，報紙卻甚為寡少，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黃遵憲在日期間特別留意東京報社與新聞紙盛行的狀況，故《日本雜事詩》除有詠〈新聞紙〉詩「一紙新聞出帝城，傳來令甲更文明。曝簷父老私相語，未敢雌黃信口評」外，<sup>85</sup>注文讚「新聞紙山陬海澨無所不至，以識時務，以公是非，善矣」，時事政論傾向「不曰文明，則曰開化」。在他較晚成書<sup>86</sup>的《日本國志》〈學術志〉中「新聞紙論列內外事情以啟人智慧」的敘述下，黃遵憲則引用明治十一年（1878）的統計資料來說明日本日報林立的情景：

東京及府、縣新聞紙共二百三十一種；是年發賣之數，計三千六百一十八萬零一百二十二紙。在東京最著名者，為《讀賣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郵

<sup>81</sup> 《扶桑遊記》，頁59-60。

<sup>82</sup> 《扶桑遊記》，頁65。

<sup>83</sup> 依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初版〈錢幣〉一詩云「聞說和銅始紀年，近來又學佛頭錢；雙雙龍鳳描新樣，片紙分明金一圓」，下注「……明治四年，金、銀、銅三貨並鑄，式皆精美。六年，復造紙幣，當墨西哥銀錢一枚者，曰金一圓」。換算一圓與當時通行於上海的墨西哥銀元（因上印西班牙國王之像，俗乎為「佛頭銀元」）一元約等值。故可推測，當時日幣兩百圓相當於兩百銀元。參見《日本雜事詩》，頁627-628。

<sup>84</sup> 柳北年譜，《「明治文學全集4」成島柳北 服部撫松 栗本鋤雲集》，頁427。

<sup>85</sup> 見初印本第50首〈新聞紙〉原詩，《日本雜事詩》，頁642。

<sup>86</sup> 《日本國志》於1887年成書，但遲至甲午戰後（1895）才出版。

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東京曙新聞》，多者每歲發賣五百萬紙，少者亦二百萬紙云。<sup>87</sup>

可見明治新政十年後日本報業之昌盛繁榮，報章上的時事論說往往有影響社會觀感或左右輿論的效應。成島柳北主持的《朝野新聞》與栗本鋤雲擔任主筆的《郵便報知新聞》便是舉足輕重的報社之一。讀者多，報館發行量大，營業利潤亦可觀，故可以提供報社記者較優厚的薪資。故該文推測：「試想在東京十元或是十五元之新進記者，若被外國同業聘請，至少領受四五十圓之謝銀。然而自遠道而來此不便之地的《循環日報》社長，進入東京報社，雇用費僅得二百圓，可推知彼在本國社長的月薪不過僅有三四十銀元」。

據費南山 (Natasha Vittinghoff) 考證王韜身為《循環日報》主筆時報社的聘僱狀況與財政開支，主筆月薪大約就是三四十銀元。<sup>88</sup>又證諸《扶桑遊記》，雖然王韜在序言中表示東瀛之行乃因「東道有人，決然定行計」，<sup>89</sup>並沒有言及邀約的條件，但仍有蛛絲馬跡呈現他在日四個月的花費與薪資問題。《扶桑遊記》於五月二十九日，即王韜抵東京十餘日，與中村正直筆談時道：「特諸同人擬留予在其國中兩閱月，繕立條約，有拘束不如人意者。余聞之，始浩然有去志」，<sup>90</sup>此處所謂「繕立條約」，當為報知社關於王韜在日酬金、開銷與及工作內容的書面協議。王韜從築地精養軒移居較蝸窄的報知社，<sup>91</sup>即為此協議當即付諸執行的條款。報知社此舉令王頓生桎梏之感，有失其名士尊嚴，故有「始浩然有去志」的強烈反應。王在日友人岡千仞當日極盡勸慰之能事，令王韜深有知遇之感，最終打消歸去之意。此後，王韜除在報知社書字、<sup>92</sup>撰寫社論，<sup>93</sup>並承諾未來《扶桑遊記》撰成後的版權<sup>94</sup>交與報知社之外，據學者考證，王韜耳聞寓神戶之清人如衛鑄生等「賣字月可得千金一事」<sup>95</sup>頗為艷羨，故

<sup>87</sup> 《日本國志·學術志》，頁800。

<sup>88</sup> 《循環日報》聘僱員工與財政狀況，按《粵報》在1886年的統計可知，主筆薪水有50-55元，編輯30元，翻譯員20元，副主筆10元。黃勝(平甫，1825-1905)1876年在香港倫敦會印刷所工作，薪水約28元。見費南山 (Natasha Vittinghoff) 著、姜嘉榮譯：〈遁窟廢民：香港報業先鋒—王韜〉，收入《王韜與近代世界》，頁332，注釋27。

<sup>89</sup> 《扶桑遊記》自序，頁5。

<sup>90</sup> 《扶桑遊記》，頁84。

<sup>91</sup> 《扶桑遊記》，頁86。

<sup>92</sup> 《扶桑遊記》，頁124。

<sup>93</sup> 據王曉秋考證，王韜在日期間，曾於《郵便報知新聞》上發表四篇文章。分別為：1879年6月23日，〈華夷辯〉、〈智說〉；6月24日，〈地球圖跋〉；6月26日，〈讀離騷〉。見《王韜與近代世界》，頁403-408。

<sup>94</sup> 王韜旅居日本達四個月，部分日常開銷及其購書款得自他在報知社賣字和出賣《扶桑遊記》版權予報知社，包括報知社屬下《郵便報知新聞》刊印王韜旅日期間所有作品。參見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一文，注148。

<sup>95</sup> 《扶桑遊記》，頁19、116。

亦設法多方從事賣文「生意」，將日本的書籍攜回香港經銷販售日本地理史志、《清史覽要》及岡千仞編譯的外國史著作（如《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諸書籍。<sup>96</sup>

綜上所述，可知《朝野新聞》〈雜錄〉一文固然沒有全盤考慮到東道主報知新聞社款待性好治遊的王韜所費不貲，<sup>97</sup>除支付酬金外還必須額外負擔的日用花費，評論失之武斷。但刊登在報紙上的這篇評論流露出的得意之情，卻頗值得玩味：盛名如王韜者流東來扶桑一事，恰恰襯出本地報刊界主筆薪資相對豐厚，日本報業在東亞世界中已佔據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進一步透露：非經官方管道，東京大報社已有能力發起並邀來國際名人至本國交流，討論合理的工作內容，進而爭取國際人士的著作權；與報刊界頗有淵源的外國史專家（如《清史攬要》增田貢、《清史逸話》作者本多正納，翻譯或輯撰外國史的岡千仞與岡本監輔）把握機會與之近距離深度筆話、辯難，恰可窺知明治維新甫逾十餘年首善之都活絡的亞際知識菁英對話交流文化氛圍。

對明治時期的日本知識界來說，王韜結合親身經驗、透過大量西文報刊掌握泰西世界最新動態而完成的《普法戰紀》展現符合時代脈動的嶄新史觀，突出於日本文化界紛紛出現的西方史地書籍，更獲致報刊界名流一致肯定。邀請王韜訪日的靈魂人物栗本鋤雲，出生於幕府侍醫之家，因與法人交好而精通法語，曾於箱根開設醫院，於幕末時期（1867年）被派至法國任日本駐法公使，1868年幕府瓦解後從歐洲返國，維新後不仕新朝。他的著作《曉窓追錄》中，對於法國的國情政令風俗文化與首都巴黎城市風貌有詳細的紀錄，堪稱幕末時期開明派士人中首屈一指的「國際通」。

<sup>96</sup> 據現存《循環日報》微縮膠卷資料，可見光緒六年正月四日（1880年2月13日）第1826號《循環日報》第三頁上刊出文裕堂的「新到日本書籍」廣告，販售：唐土名勝圖、清史攬要、元明清史略、十八史略、今世名家文抄、續今世名家文抄、通議、日本地理全圖、日本風土山水人物畫譜等諸書，到了光緒六年四月六日（1880年5月14日）第1903號《循環日報》第四頁上，又見到高度相似的書籍廣告，販售書籍為：清史攬要、唐土名勝圖、元明清史略、米利堅志、法蘭西志、并上海葛式嘯園各種新書籍、亞洲地圖、小地球等書，只是這次刊登廣告者正是《循環日報》社。這些書籍廣告的訊息，佐證王韜從日本歸來後，開始於香港當地的書店與《循環日報》報社販售日本書籍，合理推測他在香港與日本兩造間經銷書籍。

<sup>97</sup> 「日本諸文士，皆乞留兩閱月，願做東道主，行李或匱，供其困乏。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幾不知有人世事。」（《扶桑遊記》，頁16）「日東人士疑予，於知命之年，尚復好色，齒高而興不衰，豈中土名士，從無不跌宕風流者乎？」（《扶桑遊記》，頁128）；《朝野新聞》〈雜錄〉文中有一段反駁辯難之言，翻譯如下：「或有辯解者云，『足下實為毒舌之人。王氏此番來遊東京，意在與文士墨客交遊，樂觀名山大川，任職某報，僅為遊歷之一隅。』吾人以此辯無法令人信服，何以言之？試想吾輩至京阪或遊歷東隅西陬，與文士結交，訪探山水勝地，縱令囊中羞澀，亦不甘居於雇用於報社，領受薪水而身受束縛。若受束縛，豈能盡興勝遊？故若王氏若真為遊歷而來，豈會受雇某報而成桎梏之身耶？然若如據傳聞領受此薪，則確知其本國薪水為寡，故而遠道而來，受雇於我國報社，嗚呼，我國記者不亦當自豪耶？」

1874年受「報知社」所聘，任日報編輯主筆。由此可知栗本的人生經驗與王韜有多處雷同，如兩人在1867年均在法國都城巴黎參觀萬國博覽會，也在1874年出任報社主筆，更巧合地同於1897這一年辭世。

正因如此，栗本說明邀請王韜赴日緣起的〈王紫詮の來遊〉<sup>98</sup>一文提及其子貞次郎明治三年(1870)隨岩倉大使(岩倉具視)遊歐而還，途經上海所購得《普法戰紀》，攜回後栗本展讀未及半部，便大為激賞，認為此書展現的動態國際觀與己身契合，更可貴的是跳脫漢人議論的窠臼與俗套。栗本有〈王韜讚〉一詩：「慷慨論兵，心存國家。風流逃酒，迹擬浮查」，<sup>99</sup>精要捕捉了擁有多面相特質的王韜形象。後「陸軍省文庫」欲刻《普法戰紀》，邀栗本訓讀其中二卷，故栗本不僅是可視為王韜最早的東瀛知音之一，更間接促成了《普法戰紀》在日本的首刻付印。<sup>100</sup>

龜谷行在《扶桑遊記》跋文詳述邀約王韜赴東瀛的發起人群體，<sup>101</sup>除栗本鋤雲外其他幾個關鍵人物：曾派駐朝鮮的外交官，辭官後創設「大來社」發行漢文期刊《明治詩文》的佐田白茅、曾任修史館編修的岡千仞、重野安繹等人，他們往往具有在幕府從政的經歷。維新後不仕新朝，或著譯外國史，或任職於重要報刊，在新聞業中擁有舉足輕重地位，關注世界局勢動態發展與掌握新時代脈動，乃是此精英社群的共同特質。

除上述人物外，學界名士中村正直、時任崎玉縣教諭的木原先禮、《萬國史記》作者岡本監輔、任高崎知縣的源氏後人大河內輝聲(源桂閣)、漢學家森春濤等人，亦頻繁前來與享有盛譽的王韜晤面筆談，或詩賦贈答，或當面就教，甚至相互辯難，此多元異質而跨越領域的深度交流，也影響了王韜對歐洲文化的深刻思索。故1879年10月回到香港後，王韜繼續撰著法國史志《重訂法國志略》，<sup>102</sup>除了參酌《西國近事彙編》<sup>103</sup>外，大量引用的便是發行於明治十二年由高橋二郎抄譯自法國猶里氏(Jean Victor Duruy, 1811-1894)原著、由岡千仞刪定的《法蘭西志》以及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明治十二年六月發行)。

<sup>98</sup> 〈王紫詮の來遊〉(原文為日文)見栗本匏菴著，日本史籍協會編：《匏菴遺稿》(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50〔1975〕)，頁292-293。

<sup>99</sup> 見《匏菴遺稿》，頁20。浮查。漂浮海上的木筏。語出晉王嘉《拾遺記·唐堯》：「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呈現王韜在栗本心目中遊走跨越於異域與東西文化間的形象。

<sup>100</sup> 日本陸軍文庫於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普法戰紀》。

<sup>101</sup> 龜谷行，《扶桑遊記》上卷跋文，頁67-68。

<sup>102</sup> 見王韜，《重訂法國志略》(上海：光緒己丑年〔1889〕弢園老民校刊本)，凡例一。

<sup>103</sup> 主要記載同治癸酉年(1873)泰西近事。見(美)金楷理口譯，姚棻筆述(第一至三卷)、蔡錫齡筆述(第四卷)：《西國近事彙編》(上海：上海機器製造局刊印，同治十二年，1872)。

王韜在明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日記述及《萬國史記》的作者岡本監輔來訪一事。該書卷首有清使何如璋「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的書法題詞，讚譽此書網羅西學與外國史傳的宏富知識，證明了外交使節與當地知識圈往來密切，可見晚清涉外官員留心日人積極編譯撰述外國史著之一斑。岡本氏之書新出爐不久即拜見王韜，也是欣賞他橫跨東西方世界的經歷與開創新聞入史<sup>104</sup>體例的撰著模式，故急欲當面得其評點指正。王韜倒也沒讓他失望，評為「搜羅頗廣，有志於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觀。必傳之鉅製，不朽之盛業也」，似與該書卷首何如璋題詞頗為一致。但王韜繼續借題發揮，「況日邦近尚西學，得此書著其情僞，則尤切于用」，<sup>105</sup>提出對明治新政的批評：

余謂倣徇西學，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并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而學之者，又病在其行之太驟，而摹之太似也。<sup>106</sup>

批判日本當下社會競尚西學的熱潮的同時，也藉此書評論點出日本全盤西化的大勢所趨下隱藏著泯滅自身文化傳統的弊病。

與公使何如璋相仿，作為清使隨員的沈文熒，也曾為高橋二郎與岡千仞合譯之法國史《法蘭西志》撰寫序言，可見幕府垮台後明治新政甫成之新舊接壤過渡時代，作為大清公使團之一員，在爭取本國權益的同時，亦與日本朝野文士往來密切，尤其關注日本智識菁英圈新出版的世界史書籍。撰有美志、英國、法國相關史著的岡千仞，堪稱明治初期編譯西人史著的代表性人物，其撰著多部史志之主幹，往往參酌漢文所譯之相關著作，復加以增補時事近聞，編為一書。如明治六年（1873）岡千仞與河野通之根據美國格堅勃斯（George Payn Quackenbos, 1826–1881）原文而撰譯的《米利堅志》，就曾參考載錄過徐繼畲《瀛環志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聯邦志略》、丁韞良編譯的《萬國公法》及《格物入門》等來自中國的世界史地與格致書籍。<sup>107</sup>其中《聯邦志略》乃為王韜早年在上海供職「墨海書館」階段（1849–1862）同事好友管嗣復協助美籍傳教士裨治文潤色修訂的《美理哥合省國志

<sup>104</sup> 王韜與張芝軒合譯之《普法戰紀》采當時歐洲日報消息入書的著史模式，乃指該書中除敘述事件始末、戰役過程外，幾乎全數以翻譯的西報消息與議論或「報社主筆」的觀點連綴前後文。詳見拙文：〈文化傳譯中的世界秩序與歷史圖像：以王韜《普法戰紀》為中心〉分析，該文收入拙著：《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頁102–109。

<sup>105</sup> 《扶桑遊記》，頁130。

<sup>106</sup> 同上注。

<sup>107</sup> 岡千仞，《米利堅志》「例言」。見《米利堅志》（東京：博聞社、光啟社發行，明治六年〔1873〕十二月出版）。

略》。<sup>108</sup>該書於1861年易名《聯邦志略》版行，為1850–70年代中日開明文士考證海外史地的重要文獻資源，後來不僅收入《湘學新報》(1897年8月)的「史學書目提要」中，更成為1898年湖南學政所出的科舉考試題目之一，可見此書持久不衰的影響力。<sup>109</sup>

該書之序為曾任職北京同文館算學總教席的李善蘭(1810–1882)所撰，考諸王韜生平交遊，李氏乃亦為其早年供職墨海書館、傭書上海歲月的摯友，曾與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合譯《幾何原本》後九卷(1857年出版)、《談天》(1859年出版)等堪稱劃時代的天文與數學名著，代表了1850年代上海開明文人與第一波現代性思潮互動對話的模式。岡千仞完成《米利堅志》書稿後不久，恰好藉日本大臣出使中國的機會將此書帶到北京名流圈中，同文館總教席丁韞良囑李氏作序，可想見得李之讚詞時岡氏的興奮心情。<sup>110</sup>

當時岡千仞譯《英志》已得二卷，王韜展讀即知其為「視慕維廉所撰，言簡而事增，誠不朽之盛事也」<sup>111</sup>，一方面說明了王推許岡氏不僅擅於編譯外國史著，更能輯近事入史而增益之的不凡識見，另一方面也道出王早年在上海的另一忘年摯友，即與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合譯《大英國志》(1856年出版)的蔣敦復(1808–1867)，其譯著貢獻後人良多。彼時蔣雖已謝世十餘年，其譯作在扶桑的流傳接受與後續影響卻不容小覷。如《朝野新聞》主筆成島柳北與高橋基一合譯了英人趙舞尔的原著《英國國會沿革志》，並由《朝野新聞》社印行出版。<sup>112</sup>成島柳北在序言中，亦強調英國國會制度「屢改屢變」，非一日即臻於善美之境，故需徵諸文獻，以倣其典章制度，裨益國政，<sup>113</sup>呈現出明治新政後文士競著西史以收學步歐西法政制度之效的社會氛圍。

<sup>108</sup> 1859年王韜回鄉參加歲考結束後回到上海，就對管嗣復(字小異)助裨治文譯改《美里哥地志》的成果相當稱讚，認為「米利堅，新闢之地，人至者少，是編乃裨君紀其往來足跡所經，見聞頗實，倘得譯成，亦考證海外輿地之學之一助也」。見《王韜日記》，頁107。

<sup>109</sup> 相關論述參見潘光哲〈美國傳教士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的發展(1861–1896)〉，《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一期(台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1年12月)，頁188。另見拙文：〈海上法蘭西：從王韜的法國史志談晚清「海上」知識社群的思想特徵與文化實踐〉，見《中國文學學報》第4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28–32。

<sup>110</sup> 岡千仞云：「會小牧偉卿隨欽差大久保大臣赴支那北京，因寄一部于駐紮公使柳原君請諸名流評閱」(見《米利堅志》李序後補述語)；岡千仞於1884年遊歷中土，至北京時赴同文館拜見丁韞良，亦再度提及當年將《米利堅志》就教於丁氏的因緣，可見岡千仞對這兩位海外重量級人物知遇之情的珍視感念(見岡千仞，《觀光紀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152)。

<sup>111</sup> 見《扶桑遊記》，頁47–48。

<sup>112</sup> 該書於明治十二年四月印行；故該年五月十日、七月六日、九月十七日的《朝野新聞》第四頁廣告欄皆可見到此書的廣告。

<sup>113</sup> 見《英國國會沿革誌·序》(東京：朝野新聞社出版，1879)，頁1–2。

綜上所述，王韜扶桑之行引動的文化漣漪，既是自《普法戰紀》輻射出而交織形成的一場中日朝野文士的對話，亦不啻為王韜出身上海、親履泰西、香港辦報等過往豐富經歷的總驗收，更每每與東京的核心智識圈形成互為鑑鏡與相嵌連結的微妙關係。作為亞際跨域融匯的「樞紐」人物與開啟東西文化融攝的可能性上，王韜無疑扮演了東亞世界吐納融匯西方經驗過程中的關鍵角色，此「日本經驗」因縮合了東亞近代報刊跨疆域與跨文化流通的功能，凸顯出中日知識菁英與開明文士輯譯世界史地書籍時往往以新聞或時事入史的特徵，鮮明捕捉了政經社會與文化觀念面臨劇變，東亞知識人汲汲尋思對策的時代面容。

然王韜遠離日東，其迴響卻未嘗告終。我們在明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朝野新聞》復睹王韜之作，乃為〈循環日報中我邦ノ毒婦阿傳ノ詩有錄シラ看官ニ示ス〉為題的七古長詩。<sup>114</sup>應是返港後王韜將〈阿傳曲〉一詩刊登在《循環日報》上，而後《朝野新聞》轉載其內容。對照《扶桑遊記》，此詩乃為王韜在東京時六月九日晨與小西藤田、栗本鋤雲至新富劇院欣賞戲劇阿傳故事後為文賦詩的心得。此劇係改編自三年前(1876)發生在東京淺草天王橋畔旅社中女子手刃男子的凶殺案，王韜在日記中扼要記載女兇手阿傳之生平顛末，亦紀載下明治時期「時事劇」劇情、劇院場景與日本優伶演出特色之一端。<sup>115</sup>

值得進一步探析的是，與前一節分析過的〈花谿女史小傳〉相若，但刊登時間較早，為《點石齋畫報》第七號<sup>116</sup>《淞隱漫錄》中〈紀日本女子阿傳〉一篇，畫師吳友如配圖一幅，皆為王韜結束香港廿三年歲月於光緒十年(1884)二月回到上海後，將扶桑見聞改編後刊登於報刊的例證。<sup>117</sup>故事敘述阿傳乃上野農家女，頗能知書識字，所

<sup>114</sup> 詩云：野鴛鴦死紅血迸，花月容顏虺蜴性。短緣究竟是孽緣，同命今番為並命。陰房鬼火照獨眠，霜鋒三尺試寒泉。令嚴終見爰書麗，閭里至今說阿傳。阿傳本是農家女，絕代容華心自許。爭描眉黛鬥遙山，梨花閉戶春無主。笄年偷嫁到汝南，羨殺檀奴風月諳。花魂入牖良宵短，日影侵簾香夢酣。歡樂無端生哭泣，溫柔鄉裡風流劫，一病纏綿不下牀，避人非是甘岑寂。溫泉試浴冀回春，旅途姊妹情相親。一帆又指橫濱道，願奉黃金助玉人。世少盧扁真妙手，到底空牀難獨守，狐綏鵠合只尋常，鰥誓鵲盟無不有。伯勞飛燕不成群，伉儷原知中道分。手調鴛湯作靈藥，姑存疑案付傳聞。一載孤棲歸省父，骨肉情深盡傾吐。阿妹貽書伴弗省，真成跋扈胭脂虎。市太郎經邂逅初，目成已見載同車。貌豔芙蓉嬌卓女，才輸芍藥渴相如。自此倚門彈別調，每博千金買一笑。東京自古號繁華，五陵裘馬多年少。旅館淒涼遇舊歡，焰搖銀燭夜初殘。詎知恩極反生怨，帳底瞥擲刀光寒。含冤地下不能雪，假手雲鬢憑寸鐵。世間孽報豈無因，我觀此事三擊節。阿傳始末何足論，用寓懲勸箴閨門。我為吟成阿傳曲，付與鞠部紅牙翻。

<sup>115</sup> 見《扶桑遊記》，頁106-108。

<sup>116</sup> 據筆者考證，該文刊登於《點石齋畫報》上應為光緒十年閏五月中澣(西曆1884年7月7日左右)。

<sup>117</sup> 《淞隱漫錄》中有數篇故事或筆記是來自王韜的東游見聞：如〈記日本女子阿傳〉、〈柳橋艷跡記〉、〈花谿女史小傳〉、〈橋北十七名花〉、〈東瀛才女〉等。

作和歌抑揚婉轉。擁有人稱「玉觀音」美貌的阿傳及笄後便與情人浪之助私奔，未久，浪之助患惡疾癩症，偕往草津溫泉盼能療癒，然不見效，經人介紹後往橫濱投美國名醫平文延治。橫濱船匠吉藏垂涎阿傳美色，出金助之以求歡，遂與其暗通鴿合。後阿傳夫死回鄉省父，頗不安於室，與鄉人市太郎燕好，穢聲聞鄉里，令父不安。阿傳聞東京多浪遊弟子，故前往淺草天王寺旁寓居丸竹亭旅社，竟做倚門娼生計。舊識吉藏至東京亦常光顧，卻因吉藏刺刺揭其舊日隱私而生恨，阿傳趁其醉寐時手刃之，此即為震驚一時的東京刑案之本末。

這則故事中視禮法為無物、浪跡四方，擁有過於男子之膽識的阿傳形象，與稍晚刊載的〈花谿女史小傳〉相較，看似在人品才華的描述判若雲泥，但從另一角度觀之，卻同樣彰顯了東方禮教觀中或叛逆或出格的女子形象。阿傳故事的詩歌版〈阿傳曲〉在香港與東京的日報上先後登載，其故事梗概雖在《扶桑遊記》的「日記」中已披露，但詳細記傳刊載卻是在五年後上海的《點石齋畫報》。此文固是海外風俗考察的紀錄，這則東瀛女子的「上海演繹」版中作者自詡「遯叟詩成，傳鈔日東，一時為之紙貴」<sup>118</sup>或許不無誇大成分，但若考慮到這則故事在亞際報刊界流通的過程，毒婦阿傳形象的跨域登載，未嘗不是象喻了東亞現代城市中固有倫理觀鬆動與社會秩序重組的曲折軌跡。

阿傳故事說明了王韜對明治菊壇的關注，饒具意義的是，繼〈阿傳曲〉之後不到半個月，即明治十二年十一月六日《朝野新聞》上，又刊出王韜（名曰「王紫詮」）品題漢學家森春濤之子森槐南所著戲曲《補春天傳奇》之詩歌與序言。<sup>119</sup>對照《扶桑遊記》，此事見錄於六月二十七日（陽曆七月十六日）日記，言面晤森春濤，其出示其子森泰二郎（號槐南）劇作《補春天傳奇》，遂賦六首七絕以贈。<sup>120</sup>但《朝野新聞》所刊載之〈題《補春天傳奇》有序〉在日記中未見，應可推測此序當是在新聞紙上首次面世。茲錄於下：

春濤先生今代詩人也。令子槐南承其家傳。又復長於填詞，工於度曲。年僅十七齡，而吐藻采於豪端，驚泉流於腕底。祠壇飛將，復見斯人。今夏同人小集不忍池邊長酌亭上，先生出示其令子所作《補春天傳奇》。情詞旖旎，丰致纏綿，雅韻初流，愁心欲絕。不禁有感於懷，爰題六絕句於上，以志欽佩。

<sup>118</sup> 王韜在港時期自號「天南遯叟」。引文見王韜：〈記日本女子阿傳事〉，見氏著《淞隱漫錄》，頁7。

<sup>119</sup> 詩云：千古傷心是小青，拆將情字比娉婷。西冷松柏知誰墓，風雨黃昏獨自經。秋墳鬼唱總魂銷，誰與芳魂伴寂寥。絕代佳人為情死，一般無酒向春澆。一去春光不復還，補天容易補情難。嬋娟在世同遭妬，寂寞梨花泣玉顏。好事風流有碧城，同修芳塚慰卿卿。知音隔世猶同感，地下人間聞哭聲。譜出新詞獨擅場，居然才詞勝周郎。平生顧曲應君讓，付與紅牙唱夕陽。刻翠裁紅渺隔生，怕聽花外囀春鶯。當年我亦情癡者，迸入哀絃似不平。

<sup>120</sup> 見《扶桑遊記》，頁169-170。

此文後來收在森槐南自印出版，明治十三年（1880）二月印行的《補春天傳奇》的題詞中，文字略有更動，但大意雷同。<sup>121</sup>仔細比對成書後的《補春天傳奇》，這段序文與六首七絕，即為卷首「題辭」，錄於張斯桂手書李商隱詩「紫蘭香徑與招魂」題名、森槐南所畫劇作中人馮小青肖像與題畫詩之後，沈文熒、黃遵憲之「序」、「評」前，<sup>122</sup>共同為該部劇作添增丰韻。沈文熒在《補春天傳奇》中的「序評」<sup>123</sup>讚譽此劇上承湯顯祖「臨川四夢」與《西廂》等言情鉅作之遺續，與清代著名戲曲《桃花扇》及《長生殿》作者孔尚任、洪昇之手筆相彷彿，化「芳膩冷艷」為「幽雋清麗」，也隱約道出了森槐南繼承明清言情文學傳統並企圖轉化的絃外之音。於此不僅可窺王韜與明治詩壇祭酒森春濤多次晤面及交情殷切之一斑，更重現了大清公使成員張斯桂、沈文熒、黃遵憲與日本漢學及文士名流交遊，往往受邀為詩文作品集題序贈跋，贈詩酬應的情況。

此劇主要敷演錢塘才子陳文述在孤山別業作「小青曲」遙祭小青之魂，小青地下有感，魂魄現身托夢請陳文述為西湖三女士（馮小青、楊雲友、<sup>124</sup>周菊香）修墓的故事，全劇共計四齣。故事中的小青乃馮小青，實有其人，為廣陵世家女，姿容冠絕，能詩善畫。父死家敗，委身富家子馮生，為大婦所妒恨不容，乃幽居西湖孤山，尋抑鬱而卒。原有詩集，為大婦所焚，所餘無幾，稱《焚餘稿》。詩之最負盛名者有二：「新妝竟與畫圖爭，知是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如我，豈獨傷心是小青」。其悲劇身世受到清初文人士大夫廣泛關注，有關她的小 戲劇之創作為一時之盛。<sup>125</sup>東

<sup>121</sup> 該文末載寫作日期為：「光緒五年己卯六月下旬吳郡王韜。書時游晃山歸，甫解裝也。」見《補春天傳奇·題辭》（東京：森泰二郎印行，明治十三年〔1880〕二月），頁2。

<sup>122</sup> 評語為：「以秀倩之筆，寫幽豔之思，摹擬《桃花扇》、《長生殿》，遂能具體而微。東國名流，多詩人而少詞人，以土音歧異難於合拍故也。此作得之年少江郎，尤為奇特，輒為誦『桐花萬里、雛鳳聲清』之句不置也。」進而又評道「此作筆墨于詞尤宜，若能由南北宋諸家，上溯《花間》，又熟讀長吉、飛卿、玉溪、謫仙各詩集，以為根柢，則造詣當未可量。後有觀風之使采東瀛詞者，必應為君首屈一指也。」

<sup>123</sup> 內文為：「孔雲亭之芳膩，洪昉思之冷艷，皆出於湯臨川四夢，臨川又化於王實甫《西廂記》。此曲於孔洪為近，幽雋清麗四字兼而有之，東國方言多顛倒，其曲絕無此病，尤為難得。曲入絲竹須歌而拍之，余頃將歸，無暇訂正，當俟有知音律者商酌之。」見《補春天傳奇》「序評」。

<sup>124</sup> 李漁的劇作《意中緣》即敷演明末松江才子董其昌與錢塘女子楊雲友的書畫情緣，而有「楊雲友三嫁董其昌」的諧謔故事情節。《補春天傳奇》第三齣借劇中人楊雲友之口，貶低李笠翁之作有如「荒唐小說」，李笠翁是個「齷齪的無情漢子」，隱隱透露森槐南對《意中緣》劇作情調低下的批判。

<sup>125</sup> 關於馮小青故事，曾載於馮夢龍《情史類略》、支如增《小青傳》、張潮《虞初新志》等明人著作中，其生前軼事與死後詩文至少成就了明清二十五部戲劇，十五部小說，五部民間曲藝，以及其眾多詩歌唱詠的本事與內容。其流傳凡三百年的來龍去脈，參見李旭：《孤山的人文影像：三百年「小青熱」輯事論稿》（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10），頁1-3。

瀛才子的《補春天傳奇》不啻為清中葉以降小青故事域外遺緒之一章。

關於嘉慶年間詩人陳文述(1771-1843)<sup>126</sup>的著作與事蹟東傳扶桑，且以森春濤父子為中心在明治文壇散發影響力，已有學者詳述，<sup>127</sup>但本文更想凸顯的是東亞報刊突破疆域國界的流通網絡：1870年代初期，申報館創辦的文藝期刊《瀛寰瑣紀》也曾刊出數則與陳文述及西湖孤山三女子墓有關的詩文：如十六卷<sup>128</sup>的〈孤山三女士墓陳雲伯大令為小青雲友菊香修建見《頤道堂文集》中雲伯固好事竟不知何許人也辜妄言之弔之以詩〉一詩，以及二十七卷<sup>129</sup>錄出陳文述的〈香奩偶錄詩〉(署名「碧城仙吏」)。這都說明了陳氏與才女事蹟在晚清上海文壇依然流傳稱頌，並向東瀛文化圈輻射其魅力，若再加上《朝野新聞》刊出詩文對少年天才森槐南劇作之高度評價，以及森槐南自印付梓時，鄭重將王韜之點評輯入卷首題詞，頗不乏援其盛名為發行助力的企圖，都微妙地呈顯了世變之際中日才子「情」之表述結合新式媒體宣傳與刊行的文化過渡特徵。

上述分析，可見在東京雖已不復得見王韜遊走行蹤，但《朝野新聞》上仍然轉載其「時事劇」〈阿傳曲〉以及森槐南漢文戲劇《補春天傳奇》的題辭，這固然道出了明治時期菊壇演繹新舊事之精采紛呈，但更再次證實了王韜其人其文的推許讚譽，非但為東京文壇增色不少，更代表了權威人物的重量級評價，故鄭重登載於報刊，以收廣昭公信之效。王氏參與的文會詩筵及其活動軌跡與後續不斷發酵影響的效應，更因為現代報刊傳媒而再次在東亞漢文化圈擴散漣漪，益發揭示出1870年代上海—香港—東京三城循環流通的文化迴廊中，存在著融會異文化與深度對話的廣袤空間，與前述王韜在明治時代新史觀的建構與轉變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相互印證，咸揭示出十九世紀末葉亞際文化菁英社群文化融匯過程中釋放的豐沛能量。

## 結語

復現這樣一個獨特的歷史情景，是借助文獻、以當代想像的方式擬構那一群菁英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互動。在都市的亞際文化聯絡中，最前衛的新聞文化成為

<sup>126</sup> 陳文述，初名文傑，字譜香，又字雋甫、雲伯，英白，後改名文述，別號元龍、退庵、雲伯，又號碧城外史、頤道居士、蓮可居士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慶時舉人，官昭文、全椒等知縣。學吳梅村、錢牧齋，博雅綺麗，在京師與楊芳燦齊名，時稱「楊陳」，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等。

<sup>127</sup> 明治十年(1877)森春濤選編張問陶(1764-1814)、陳文述、郭麐(1767-1831)三人之作，出版《清三家絕句》，翌年又有《清二十四家詩》，收錄陳文述詩20首。見王學玲：〈香奩情種與絕句一家——陳文述及其作品在日本明治時期的接受與演繹〉，《東華漢學》第15期(頁213-248)，2012年6月，頁234。

<sup>128</sup> 同治癸酉年十二月(1874年2月)《瀛寰瑣紀》第十六卷。

<sup>129</sup> 同治甲戌年十二月(1875年1月)《瀛寰瑣紀》第二十七卷。

跨國城市文化融通匯合的橋樑與通道，《朝野新聞》、《循環日報》與《申報》串聯東京、香港和上海大都市的文化功能史無前例，成為亞洲現代性內涵的一種標誌。

這幕情景的價值還在於它的不可複製。其一是清朝使團的官方性質絲毫無礙他們個人與異國民間媒體中文人的互動無間，也不構成與王韜的官民隔閡，而且不同國度的文人都無形地承認王韜的軸心地位。其二在於，不久之後的爭端形成東亞的衝突主題，官方政治的惡性互動總是發展成為軍事行動。「甲午戰爭」之後，更讓人們易於忘記曾經有過超越朝野界限的文化互動方式。其三是報紙的資本性質還未成為主導，所以詩文流轉融通均無阻隔。再有一點，詩酒文人行跡無妨嚴肅的學術著述，歐西史志的當代闡釋可以在東亞跨國界互補對話而不論著作權限。

作為軸心人物的王韜，在亞際文化折衝融匯中獨具象徵意義。他晚年的名帖有三十二字自我評價：「天南遁叟、淞北逸民、歐西經師、日東詩祖、書讀十年、路行萬里、身歷四代、足遍三洲」。<sup>130</sup> 涉足歐土、日本的這兩趟泛海東西洋的旅程，固然是王韜個人生命史上的不凡體驗，但確切來說，自香江往返東瀛之旅，更能凸顯出王韜身為十九世紀末葉東亞漢文化圈的「觸媒」人物，亦為進入上海、香港、東京間這條「文化迴廊」之樞紐；這三座吸納西方文明的東亞城市中盛行的報刊傳媒，更從歷史的橫向與縱深呈現了世變中的東亞知識菁英面對當前文化課題的思辯與實踐。

王韜其人其文遊走流通於三城知識菁英群體間激起的質詰辯難與切磋交鋒，無形中體現其遊走邊際並櫟括八方的特性，復揭示出此東亞三城共同因應西方衝擊而衍生複雜多元對應策略的思想底蘊。惟其為各自不同的精神脈絡與知識結構而形成互有差異的文化社群與實踐行動，益發顯示了此三者間串聯互補的活躍動能之彌足珍貴，歷歷再現了1870年代亞際文化交流對話的豐饒意蘊。

【本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才子、筆政、通人：論晚清民初『海上』知識社群的思想特徵與文化實踐」(計劃編號：NSC102-2410-H-008-009-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sup>130</sup> 王韜：〈自署楹帖〉，見《循環日報》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十二月十二日(西元1881年1月11日)，第三頁。

# 一八七〇年代的亞際文化融匯： 由《朝野新聞》所載詩文論王韜與中日菁英社群

呂文翠<sup>\*</sup>

本文以日本東京大報《朝野新聞》所刊載王韜其人其文與在日期間(1879年5月至9月)的文化活動為中心，勾勒其牽動的1870年代末葉亞際文化融匯與後續效應；《朝野新聞》頻頻轉載王氏在香港創立的中文報《循環日報》中的漢文詩歌與國際消息，也幫助我們重構王韜和中日菁英社群互動之軌跡，體現東亞城—上海、香港、東京—三地的思想文化之跨域交流對話，並重新審思其激盪與發酵的文化動能。藉此深度探究晚清社會文化轉型的多重線索，具體重繪東亞世界思想文化之眾流匯聚及相激碰撞的歷程，當能更清晰揭示1870年代亞際文化融匯的現代性。

**關鍵詞：**王韜 《朝野新聞》 《循環日報》 晚清中國 亞際文化

---

<sup>\*</sup> 呂文翠，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Inter–Asia Cultural Fusion In The 1870s: On Elites of China and Japan by Wang Tao’s Writings Republished in *Choya Shinbun*

Lu Wen–tsuei\*

This study intends to portray inter–Asian cultural fusion and its successive impacts in the end of 1870s, focusing on Wang Tao’s works and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between May to September 1879 as seen in one of the major newspaper issued in Tokyo, *Choya Shinbun*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news). *Choya Shinbun* had been frequently republishing Wang’s writings and international news published in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a Chinese newspaper Wang founded in Hong Kong, and so now helps researchers reconstruct traces of Wang’s interaction with elites of China and Japan. This reflec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in cultures and thoughts among three East Asian cities—Shanghai, Hong Kong, and Tokyo, and reexamines the impact and reaction caused by the culture dynamics of this communication. The modernity of inter–Asia cultural fusion shall be clearly revealed through this in–depth research into the multiple clues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870s as well as a re–portrayal of the history and path of the mutual impact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Keywords:** Wang Tao *Choya Shinbun* *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 Late–Qing dynasty China Inter–Asia culture

---

\* Lu Wen–tsu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